

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 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

許 慧 琦**

摘 要

本文全面考察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愛德華·卡本特 (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 的性理論進入中國前後的發展與轉化歷程。我將藉由此一個案研究，凸顯近代性學的異質性，並探究民國作者在接受或回應其思想之際，所闡發的論點、兩性思維與跨文化歷史意涵。卡本特的作品是聯繫民國時期同性戀與異性戀論述的重要思想橋梁：中國對他的著述譯介，同時含括「以異性戀為主流」和「為同

* 收稿日期：2023 年 1 月 2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5 月 2 日。

**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性愛正名」兩大面向。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多涇渭分明地介紹或引述卡本特的異性戀與同性愛思想。我們應如何理解上述民國時人譯介與挪用卡本特思想的獨特現象？換個方式問，這種現象反映出當時中國譯介者什麼樣的思想傾向與文化性格？要釐清這些問題，必須在跨文化多語際的脈絡下考察卡本特思想的流轉和在地演變。

本文的主要論點有二。首先，我把卡本特的性理論詮釋為「人情性學」，並說明其與歐陸所代表的「科學性學」之差異，以釐清民國譯介外來性學的多源性與思想定位。其次，我將闡明卡本特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既參與也見證了民國社會建構起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的現代性/別文化過程。這個過程顯示卡本特對理想情愛的描摹，被中國論者一廂情願地理解為異性戀話語，他對男男情愛的深切詠讚則如曇花一現，被漸居主流的同性戀疾病化理論所取代。

關鍵詞：卡本特、同性戀、異性戀、文化轉譯、民國時期

前 言

自美國華裔學者桑梓蘭(Tze-Lan Sang)的專書《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於2003年出版以來，中外學界關於近代中國同性戀論述的研究，不斷推陳出新。康文慶(Wenqin Kang)、許維賢、陳靜梅與姜學豪(Howard

Chiang)等文史學者的研究,對當代社會了解民國時期關於同性情慾的各類書寫,貢獻良多。¹ 此類著作,修正了當代中國社會普遍誤以為同性戀在 20 世紀中後期才出現的觀點。這些研究,已交相勾勒出民國同性戀論述的發展趨勢。要言之,即在 1920 年代,肯定與批判同性愛的正反觀點並存;到 1930、40 年代,社會各界則普遍視同性戀為病態,且需積極防治。上述學者的視角與關懷雖異,卻不約而同提及經常現身於民國同性戀論述的愛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與哈夫洛克·藹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兩位英國思想家。² 桑梓蘭更分別以卡本特與藹理士的著述,代表民國社會對同性戀／愛從寬容到嚴峻的不同階段態度。她指出,卡本特那種頌揚學校內外同性愛的自由派論述,到 1920 年代末逐漸在中國社會失勢。此後,由藹理士那類基於正常／變異性慾二元對立的科學性學理論取而代之,成為主

-
- 1 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陳靜梅,《現代中國同性戀愛話語譯介及小說文本解讀》(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這些學者都曾指出,在民國時期,「同性愛」、「同性戀」與「同性戀愛」都是英文「homosexuality」的中文譯名,而「同性愛」在 1920 乃至 1930 年代,比「同性戀」更常為論者使用。在本文中,除非特別註明,「同性愛」與「同性戀」及「同性戀愛」可互相通用。
 - 2 Edward Carpenter 之名,在 20 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曾被譯作卡本特、加本特、嘉本特、卡賓塔、谷本忒、卡本忒、卡本德、卡本脫、嘉賓特、加本德及加賓特爾等;其譯名從未被統一。當代學者較常用加本特與卡本特二者。本文以 Carpenter 的英文發音較近似「卡本特」,而採此一譯名。

流權威。³ 用陳靜梅的形容，這是個同性愛論述從「多音並存」到「單音獨奏」的演變過程。⁴

爲求更清楚掌握民國同性戀觀及其演進，確實有必要區隔卡本特與藹理士的論述本質，因爲他倆雖皆捍衛同性戀，重點與意境卻有別。卡本特與幾屬忘年好友的藹理士出版這類著作的主要動機，都是爲爭取同性戀在英國成爲合法行爲。他們同樣強調同性戀乃與生俱來，因此無關乎犯罪。不同之處，在於學醫的藹理士基於科學立場闡釋性逆轉（sexual inversion，19世紀指涉同性戀的詞彙），將之視爲先天的性異常（abnormality）發展。他也相當關注如何預防後天環境因素導致的同性戀行爲。⁵ 相形之下，卡本特的著作雖展現對當時最新性學研究成果的掌握，卻不受醫學或生理學等科學限制來談論同性戀。理工出身也熟稔經典文學的卡本特，從自身經驗、實證觀察與人文社會思維出發，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同性戀的同情與理解。他秉持人文精神抒寫同性愛（homogenic attachment），並融匯美學、哲學、文學與歷史元素，論證同性愛自然、健全且有益社會發展。

在前述當代學者的研究中，卡本特象徵著民國時期爲同性愛辯護的首要外國思想權威。實則卡本特在當時的中國，並不僅只啓發或影響同性愛論述。熟悉近代中國性別與婦女史之人，對卡本特應不陌生。民國進步報刊中討論情愛問題之文，常將卡本特與瑞典教育家愛倫凱（Ellen Key, 1849-

3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122.

4 陳靜梅，《現代中國同性戀愛話語譯介及小說文本解讀》，頁63-116。

5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 Sexual Inversio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08).

1926)並列爲鼓吹男女自由情愛的精神導師。⁶ 與此同時，卡本特專爲同性愛辯護而寫的〈中性論〉(*The Intermediate Sex*)，在 1920 年便有中譯本。這表示當時他作爲同性愛宣揚者的身分，應已爲中國文化界所知。⁷ 他在該文稱許「混合氣質的男女」(即中性者)，並捍衛同性情慾的高尚與健全性質。這些論點，頗有別於愛倫凱主張異性戀且批判「第三性」(the third sex)那種男不男女不女的思想。(詳後)相較於當時傳入中國的其他歐美性學家，只有卡本特明確表示同性戀既非疾病，亦非退化。卡本特既宣揚兩性情慾解放，又讚美同性崇高戀愛，展現出比葛理士等外國思想家更鮮明的同／異性戀論述歧異。

由上可知，卡本特的作品是聯繫民國時期同性戀與異性戀論述的重要思想橋梁：中國對他的著述譯介，同時含括「以異性戀爲主流」和「爲同性愛正名」兩大面向。五四後期到 1920 年代末，可謂中國社會從內外雙重視角重新界定個人的關鍵時代。一方面，民族主義與科學優生觀驅策個人擺脫傳統，以發展「新人／國民」身分來貢獻國家、改造社會與進化種族。這些意識形態也滲透進學校與職場等社會機制，管控個人的身體表現與時間運用。另一方面，論者爲追求新文化、兩性平等與新性道德，開始多方探索性慾在性行爲、性關係及性／別傾向與認同所彰顯的個人主體性。一言以蔽

6 許慧琦，〈愛倫凱在中國：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7 (2021 年 6 月)，頁 1-69。

7 例見 Edward Carpenter 著，正聲譯，〈中性論〉，《婦女雜誌》(上海)，卷 6 期 8 (1920 年 8 月)，頁 1-14。嘉本特著，海燕譯，〈譯著：戀愛論：第七章：中性〉，《民國日報·婦女週報》(上海)，號 28 (1924 年 3 月 5 日)，頁 3-5。

之，這是中國人首次被性慾化的歷史性時刻。個人，尤其女人，成爲「有性慾的主體」(the sexed subject)。⁸ 上述雙重視角，主要受到性學與優生學等西方思想的啓發，而賦予中國個人主體性以現代新意涵。西方性學廣泛結合生物學、醫學、犯罪學、心理學與社會學等領域，探究人類的性從慾望到行爲的各種表現。中國知識分子受此類作品影響，開始以「正常與變態」來劃分並理解人類性慾。這種新現代性慾觀，伴隨中高等學校教育的推廣與自由婚戀思想的勃興，交相促成同性愛與異性戀論述伴生的社會思想背景。卡本特的思想，便在這樣的時機進入中國。他的《愛的成年》(*Love's Coming-of-Age*, 1896)一書，兼論男女相戀與同性之愛。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多涇渭分明地介紹或引述卡本特的異性戀與同性愛思想。⁹ 亦即，論者若非只援引卡本特對自由結婚或婦女解放的觀點來推廣異性戀，就是集中翻譯他的中性論或校園內的同性愛關係。這些中國作者似乎並未困擾於卡本特既提倡男女自由結婚的異性戀，同時又禮讚男男或女女兩心相許的同性愛思想。他們甚至任意擷取卡本特作品的某部分來發揮自身論點，且幾乎無人指出或質疑卡本特愛慾論述中可能有的思想矛盾。譯介卡本特討論同性愛的中文出版品，與引述他有關異性戀的中文論著，可謂平行並存於民國社會，各自

8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7; 宋少鵬, 〈清末民初“女性”觀念的建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期5(2012年), 頁102-116。

9 *Love's Coming-of-Age* 一書, 在民國時期的不同版本的中文譯名; 除了《愛的成年》之外, 還包括《男女關係論》、《戀愛論》、《戀愛的成熟》、《戀愛之理想境》與《加本特戀愛論》。本文將之譯為《愛的成年》。相關討論, 詳見下文。

爲政，不相衝突。

我們應如何理解此種民國時人譯介與挪用卡本特思想的獨特現象？換個方式問，這種現象反映出當時中國譯介者什麼樣的思想傾向與文化性格？要釐清這些問題，必須在跨文化多語際的脈絡下考察卡本特思想的發展和在地演變。截至目前，不論卡本特在中國的譯介情形、或他的作品在中國被接受與挪用的歷史面目，都仍相當模糊。此乃因研究同性戀史、兩性關係與婚戀史的學者，僅舉卡本特的幾篇譯作爲例來發揮自身研究主題的論點。其結果，是使卡本特在中國被呈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段介紹。

有鑑於此，本文將較全面考察卡本特的性理論進入中國前後的流轉歷程，並探究民國作者在接受或回應其思想之際，所闡發的論點、兩性思維與跨文化歷史意涵。聚焦於近代個別外國思想家爲對象的研究，有擴展近代中國史視野、刺激多維思考的價值。卡本特的研究個案，尤其具有允許我們探索民國同性戀與異性戀論述互涉相生的重要意義。我將先綜述卡本特思想之緣起，其核心理念與主要關懷，以闡釋他的獨特性學風格。接著，我集中分析他的代表作《愛的成年》與《中性論》在民國社會經歷的文化與思想轉譯。之後，我考察 1930-40 年代的中國論者對卡本特思想的詮釋，以檢視時人對同性愛與正常／變態性慾的態度演變。

本文的主要論點有二。首先，我把卡本特的性理論詮釋爲「人情性學」，藉此對照其與歐陸所代表的「科學性學」之差異，以釐清民國譯介外來性學的多源性與思想定位。「人情」此字眼，援引自胡秋原(1910-2004)在 1920 年代末一篇悼念卡本特的論文；胡在該文形容卡本特具有「人情的科學」

觀。¹⁰ 本文用「人情性學」概括卡本特的性理論特質，以凸顯其性論述所強調的人文精神、人本關懷與情感本位，並呈現近代歐洲性學的異質取向。此外，我強調卡本特的人情性學與科學性學論述的本質差異，意在闡明為何卡本特的中性論獨力難支，無法成功為同性愛正名。此乃因他的人性性學側重人社思維與感性意識，而不敵醫學或生理學本位的科學性學自19世紀已建立起的性慾論述權威。¹¹

其次，我將闡明卡本特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既參與也見證了民國社會建構起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的現代性／別文化過程。這個過程顯示卡本特對理想情愛的描摹，被中國論者一廂情願理解為異性戀話語；他對男男情愛的深切詠讚則如曇花一現，被漸居主流的同性戀疾病化理論所取代。本文顯示，這些民國論者翻轉卡本特作品原意的性論述，展現的是美國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謂「異性戀範式」(Heterosexual Matrix)意識。巴特勒用「異性戀範式」，指涉一種具支配權力的話語或認識論機制，其將各種身體、性別與慾望都認定為先天的自然表現，以此讓人們理解自己所身處的文化運作。¹² 這樣的範式，也可稱為原型、

10 秋原，〈新故的卡本特〉，《北新》（上海），卷3期15（1929年8月），頁37-65。

11 近代歐美社會討論性問題時，明顯較推崇自然科學學門的專家學者，例如醫生、生物學家等。有研究指出，卡本特沒有醫生身分，因此他的性論述，相對而言沒有其好友藹理士來得有權威、受重視。見許慧琦，〈致藹理士(Havelock Ellis)：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的跨界挪用與革命反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57（2022年5月），頁153-154。

12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9, 194. 雖然巴特勒此書的中譯本將

母體、或觀念之所由生，呈現出具強制特質的性常態。其中，男女兩種生理性徵決定其外在氣質表現（即社會性別），也決定其性慾對象只朝異性發展，以繁衍後代。所有不符此種範式的身體性徵、性別特質與性慾取向，一律被視為不自然，非正常，應加以治療與預防。本文論證，民國作者基於異性戀本位思維任意挪用卡本特的思想並僭據其論述權威，來為他們的現代異性戀認識論服務。姜學豪的專書《閹人之後：近代中國的科學、醫療與性的轉變》(*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2018)，以「知識論現代性」(epistemic modernity)的概念，闡釋近代中國如何借助西方科學與醫學，對性與慾望發展出新認知體系。根據姜學豪的詮釋，「知識論現代性」表現為一系列持續進行的實踐和話語。在其中，不同知識體系與國家社會公權力互動時，產生如性慾等特定的經驗類型，或形塑像同性戀這樣的新主體認同。¹³ 在相當程度上，姜學豪所詮釋的「知識論現代性」，正是近代中國形構出「異性戀範式」的文化論述機制。掌握論述權威的各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員、知識菁英或各領域專家學者。他們身處社會政治變動不居且文化新舊雜陳的民國時期，援用外來理論透過各類出版媒

「Heterosexual Matrix」譯為「異性戀矩陣」，但我認為大多數中文讀者並不盡然清楚「矩陣」的意義，且這個字眼在此並未被清楚詮釋。其他學者對於「Heterosexual Matrix」的中譯名，還包括「異性戀鑄模」、「異性戀母模」與「異性戀範式」。我認為「異性戀範式」的文意較清楚，所以本文採用這個譯名。巴特勒書的中譯本，見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13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pp. 125-177.

介，向大眾傳播「(異)性(戀)」的科學「真理」(truth)。

本文透過卡本特在中國的個案研究，既呼應、也擴充巴特勒及姜學豪的理論。巴特勒闡述的「異性戀範式」，主要發展於資本主義與父權家庭制互為作用的歐美社會。而異性戀論述在近代中國從形成到居於主流的1920與30年代，則是國家分裂，民族主義與政黨力量崛起並參與性話語的動盪時期。我將引證解說民國論者如何出於改造社會與優生國族等意識形態，透過對卡本特思想的取捨，形構起「顧全大局」的異性戀範式。姜學豪的研究主要舉張競生與潘光旦的同性戀論辯為例，說明「知識論現代性」運作與發展模式。¹⁴ 本文則對照中國譯介卡本特的同性愛與異性戀作品，綜觀民國的性／慾論述朝異性戀常規主流化演進時，對卡本特性學思想的取捨。在結論處，我將綜述研究卡本特性學思想在民國發展的歷史意義、當代啟發與學術價值。

一、卡本特的人情性學精髓

卡本特並不是民國時期唯一為同性愛辯護的外國思想家；但他以綜攝科學、人社與宗教領域的廣袤思想，來讚揚與推崇同性情愛的力道，當時無人能出其右。卡本特以詩歌、散文詩和社會論述等不同文類，來描繪他所研究、理解與體驗的性／慾。他的作品展現出深邃的文學哲思，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願景想像。這種風格，無法在民國論者也引介的理察·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0-1902)或

14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pp. 130-177.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 1868-1935)等德國性學家的作品中發現。英國學者海克·鮑爾(Heike Bauer)用「文藝性學」(literary sexology)來凸顯英國性理論在19世紀末的特色，以此與歐陸(尤其德國)「科學性學」(European scientific sexology)偏重醫學、法學與犯罪學的趨向做區隔。鮑爾表示，英國性理論的文化背景與思想資源多元豐富。外來的歐陸科學性學，提供英國社會重要的學理啓發。社會主義、改革運動與達爾文演化論勃興等國內發展，則連帶引致英國開始重視個人行為與社會發展的關連。英國性學理論家以詩人兼散文大師約翰·艾丁頓·西蒙士(John Addington Symonds, 1840-1893)、卡本特及藹理士爲首，發展出藉文藝來思索與表達人類性慾及其社會意義的創作型態。這些文藝作品反映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與希臘精神(Hellenism)，即鮑爾所謂英國「文藝性學」特有的文化美學內蘊。¹⁵換言之，維多利亞晚期的英國性科學，是醫學等自然科學學門、社會改革政治運動，以及多元的文藝作品交相形塑的論述領域。性學家在此一新興範疇生產有關性的科學真理，來取代歐洲基督教社會透過告解來排解性慾問題的宗教儀式。鮑爾認爲，卡本特在這樣的思想氛圍開始思考性／慾問題；他的相關著述，進而推動英國形塑同性情慾理論的文藝書寫。¹⁶

15 Heike Bauer, *English Literary Sexology: Translations of Inversion, 1860-1930*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52-81. 另見 Michiko Suzuki, "The Translation of Edward Carpenter's *The Intermediate Sex*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Heike Bauer ed., *Sexology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ncounters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97-215.

16 Heike Bauer, *English Literary Sexology: Translations of Inversion, 1860-1930*, pp. 73-79.

鮑爾的論點，有助我們理解英國性理論不同於歐陸性學的文化特質；但其實文藝只是卡本特性學的其中一環。本節用「人情性學」來勾勒卡本特論述性／慾課題的獨有特質，意在不只將之與歐陸的科學性學區隔，也可分殊其與藹理士等人的文藝性學之別。誠然，性學不論在歐陸或英國，其本質都是跨學科多領域。德國性學所涵攝的知識範疇，也絕不限於自然科學。卡本特的性學洞見，確實折射出他博古通今的思想底蘊。從人文歷史哲學，到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與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學，都是他思考性慾問題的資源。但其他性學家也多方參酌眾多不同學門的資訊與概念，各自展現廣博學識與論述眼界。藹理士的7卷《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就充分展現他如百科全書般的飽學才識。我認爲，卡本特性學不同於其他性學家的最大特色，在於他的「人情」觀。他特別重視人類的自然情感與本能，主張性的科學研究應融入這些真實深刻而直觀的生命體驗。對他而言，實證研究結果雖重要，卻不能無視個人的主觀感受與生活經驗。他因此強調理智情感並重，來考察個人性慾與他人及社會之間的關係。卡本特發展人情性學，旨在矯正現代科學獨尊理性爲客觀普世標準的短見。這種以情爲本來涵攝人社與自然科學的思維，讓卡本特的著作既有別於西蒙士較偏文藝與哲理的性文化思考，也不同于藹理士更重醫學與生物學分析的性心理研究。

卡本特是英國作家中最早表明支持同性戀，且不畏權勢爲同性戀辯護者。他的言行與生活模式，都與自己出身的上層中產社會所遵守的文化慣習或階級觀念大相逕庭。他日後回憶道，「在家時，我從來沒能真正感到自在過(at home I

never felt really at home)」。¹⁷ 卡本特的「不自在」感，源於他幾個人格特質，一是他自稱的敏銳善感，二是他本能排斥家中的階級優越意識與性別不平等文化，三是他不到 10 歲就察覺自己比較喜歡同性。這些自幼展現的個性，預示卡本特成年後與眾不同的生涯規劃與生活方式。卡本特 20 歲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就讀，在數學與物理學方面有出眾表現。他卻因青少年時期曾仰慕一名堂區牧師，而有從事神職的想法。¹⁸ 因此，他申請並獲得神職獎學金，成為助理講師，且年屆 25 歲便被聖公會的伊利主教任命為執事(Deacon)。與此同時，美國詩人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觸及男男友誼與愛慾的詩作，卻喚醒卡本特內在對同性情感的熱切渴求。卡本特想掙脫體制束縛與社會成規的內在渴望，讓他益發對工作環境與生活周遭（他形容為庸俗虛偽）人事規範，感到厭煩窒息。教會視同性情慾為罪孽的譴責態度，更與他身心愈加明確的同性戀傾向背道而馳。¹⁹

1874 年，30 歲的卡本特決定離開自己的階級與生活舒適圈。他辭去劍橋的校內講師工作，放棄成為牧師的志業，並刻意擺脫中上階層不事生產與逸樂矯飾的文化習性。他以劍橋校外推廣教育的講師身分，到雪菲爾(Sheffield)等北英

17 Edward Carpenter,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 13.

18 Edward Carpenter,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pp. 14-15.

19 Brian Anderson, *Edward Carpenter, A Victorian Rebel Fighting for Gay Rights* (Leicestershire: Matador, 2021), pp. 25-44.

格蘭工業城市教授天文學，結識不少當地各業工人。²⁰ 33歲時，卡本特因家中投資事業所需，赴美考察，期間圓了拜會惠特曼的夢想。自此，他更深刻體認解放自我、追尋生命真諦的重要性。1881年，37歲甫喪母的卡本特，辭掉耗損他太多心力時間的教職，打算靠自己的儲蓄過活，並開始投入詩文創作。隔年，卡本特因父親辭世而繼承大筆遺產，無經濟後顧之憂，得以真正隨心所欲生活。1883年，他在離雪菲爾不遠處的米爾索普(Millthorpe)蓋了棟兩層樓房，跟與自己熟識的工人家庭合住。在那裡，他展開一面從事體力勞動（包括務農與到市場吆喝叫賣他親手製造的真皮涼鞋），一面從事寫作的新生活。在與卡本特同階層的人眼中，他選擇的新生活模式，降低了他的身分地位且簡陋粗俗。但對他來說，此種兼具腦力與體力勞動、接近大自然的生活，能平衡與健全身心，提升性靈。卡本特更與未受過正式教育、小他23歲的工人喬治·梅若(George Merrill, 1867-1928)成爲戀人，共度往後近40年的公開同居生活。此後的卡本特與工人群眾打成一片並彼此分工合作，真正活出自己。²¹ 這樣的勞動生活新經驗，讓卡本特情感與創作皆如意，也連帶強化他對資本主義霸權運作的種種不滿，驅使他發展出社會主義思想。²² 同年，卡本特出版自己的重要代表作，散文詩集《邁向民

20 Sheila Rowbotham, *Edward Carpenter: A Life of Liberty and Love* (London: Verso, 2008), pp. 46-64.

21 Brian Anderson, *Edward Carpenter, A Victorian Rebel Fighting for Gay Rights*, pp. 45-58.

22 Edward Carpenter,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pp. 114-115; Sheila Rowbotham, *Edward Carpenter: A Life of Liberty and Love*, pp. 65-86.

主》(*Towards Democracy*)第一卷。²³

卡本特在自傳中，將《邁向民主》定位為自己日後著作的思想泉源，涵容他所有核心關懷，包括同性情愛、婦女解放、社會改革、文明批判與天人和諧。卡本特在此詩集呈現的「民主」意涵，不同於一般人認知的特定政治制度或統治形態，而是為人處世與聯繫人己的言行表現，是自然真誠做自己並友愛他人的同志精神。簡言之，卡本特所謂的民主，是一種「激進的新生活方式」(a radical new way of life)。²⁴ 他賦予民主以個人性解放的意涵，並認定社會應以達到這種民主精神為改革宗旨。²⁵ 卡本特在詩作中袒露內心隱藏許久的同性渴望，讓自己的觀察省思與情慾想像，徜徉在無限寬廣且具療癒能量的大自然。²⁶ 卡本特後來與讀者分享他寫此書的心路歷程時，表示「自由」(Freedom)和「平等」(Equality)，是當時主導他思考與表達的兩大關鍵概念。²⁷ 這兩大概念，即卡本特後半生致力於為同性戀者爭取的生存狀態。他深信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最能充分體現與交融在愛當中。愛，無

23 卡本特在 1885、1892 與 1902 年，陸續出版了《邁向民主》第 2、3、4 卷。1905 年，該書首次以全 4 卷集成 1 冊的樣貌問世。Edward Carpenter, *Towards Democracy*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5).

24 Heike Bauer, *English Literary Sexology: Translations of Inversion, 1860-1930*, pp. 77.

25 Sheila Rowbotham, "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 A Very Modern Victorian," *Key Words: 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7 (2009), pp. 8-19.

26 Sheila Rowbotham, *Edward Carpenter: A Life of Liberty and Love*, pp. 71-75.

27 Edward Carpenter, "A Note on 'Towards Democracy,'" in Edward Carpenter, *Towards Democracy*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22), p. xviii.

疑是卡本特展開新生後的思考與寫作基調。²⁸ 但卡本特所歌頌的愛，並非愛倫凱那種只存在於男女之間的愛。他關於愛與性的書寫，也有別藹理士那種力求客觀並展現醫學專業的中立口吻。愛與性——更精確來說，是爭取能自由平等享受愛與性——對卡本特而言是非常私人的。因此，即使他深諳自然科學知識，卻拒絕用漠視情感的唯理筆調，來展現自己在這些課題的論述權威。卡本特重視描繪個人的內在感受，對當時英國社會的各種問題，也總以自我覺醒與提升個人道德為解決之道，而非僅要求變革體制。

這種「在真愛中表現自由與平等」的信念，主導著卡本特的情慾論述，並體現於《愛的成年》與《中性論》這兩部代表作。卡本特在 1890 年代後的寫作，聚焦於人性、性慾、自由、解放與兩性平等課題，並主張性本能的自由表達。²⁹

《愛的成年》成書時，受累於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同性戀審判案在英國掀起的反同性戀風潮；出版界欲明哲保身，而拒絕發行該書。卡本特只得靠自己擔任編委的勞工出版社(The Labour Press)，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刊行《愛的成年》。³⁰ 為了避免遭言論管控，他直到此書 1906 年的第五版，才加進旨為同性戀辯護的〈中性論〉，

28 Charles Vale, "Edward Carpenter," in Edward Carpenter, *Towards Democracy*, pp. i-xvi.

29 Brian Anderson, *Edward Carpenter, A Victorian Rebel Fighting for Gay Rights*, p. 91.

30 關於《愛的成年》在英國面臨的種種出版困境與經過，見 Edward Carpenter,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pp. 194-198. 關於對英國同性戀史的發展影響深遠的王爾德案始末，可參 David Schulz, "Redressing Oscar: Performance and 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 *TDR* 40:2 (summer 1996), pp. 37-59.

成爲書中第七章。³¹ 1908年，卡本特集結〈中性論〉跟其他3篇也是談同性關係的文章，出版同名論文集《中性論》(*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此二書清楚顯示卡本特是以男男關係爲中心，來開展其愛慾論述。卡本特強調建設新社會的重要個人基礎，在於改變過去錯誤偏差的性觀念，並重新欣賞珍視自己的身體。他深信誠實與純潔的親密關係，肇始於男女都不再把性看作骯髒、可恥或可交易的行爲，而能探索並掌握自己的身體。卡本特從未認定這種新的健全性關係，只存在於兩性之間。當他討論婚姻的理想樣貌時，只重在描繪兩個人(而非一男一女)因深切的互相依戀與性格相契而締結的永久美好關係。³²

《愛的成年》將性愛與生殖脫鉤的論述，格外顯現卡本特有意爲同性情慾的合理發展留後路。卡本特強調，性最崇高的首要宗旨，是與相愛之人「結合的慾望」(a desire for union)，次要目標才是「繁衍後代的慾望」(a desire for race-

31 《愛的成年》乃卡本特在1894年所寫的四篇論文(分別以小冊子的形式，由勞工出版社發行)增改後集結成的論文集。它們是《性愛，及其在自由社會中的角色》(*Sex-Love, and Its Place in a Free Society*)、《同性愛，及其在自由社會中的位置》(*Homogenic Love, and Its Place in a Free Society*)、《女性，及其在自由社會中的地位》(*Woman, and Her Place in a Free Society*)與《自由社會中的婚姻》(*Marriage in Free Society*)。其中，《同性愛，及其在自由社會中的位置》發行時，有「印製僅供私人流通」(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的註記。Edward Carpenter, *Homogenic Love, and Its Place in a Free Society* (Manchester: The Labour Press Society Ltd., 1894), front page.

32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6), pp. 19-20, 93.

propagation)。他接著解釋自己之所以特別對此說明，乃因醫學界和其他權威人士過度將「兩人之間的性關係」集中於生育目的。³³ 卡本特選擇用「兩人」(two people)，而不用「男女」或「兩性」的字眼，透露他的論述關懷不在兩性相互間的情愛。他甚至認為社會不應苛責那些缺乏母性本能的女人，因為誰也無法預知社會演化將如何發展。有鑑於卡本特曾指出「為母是女性偉大而無與倫比的工作」，因此，與其謂他真心替那些無意為母的女人辯護，不如說他主要想為同性之間無關乎生殖的情慾爭取發展空間。³⁴ 《愛的成年》將愛慾跟生殖劃下雖不決絕、卻很關鍵的界線。卡本特在此書呈現的理念，與愛倫凱將性愛與生殖緊密掛鉤的優生論調，相去甚遠，卻始終沒能為中國讀者所領會。

卡本特的《中性論》進一步發揮《愛的成年》精髓，勾描同性戀者的健全性格與深邃情慾特質，及其有益社會發展的面貌。書中的論文，主要為抵抗同性戀者所遭受的社會偏見、宗教法律的懲罰與早期性學家的病理觀而寫。卡本特用「中性」(the intermediate sex)來指涉一群人，其生理特徵與外表跟一般男人或女人無甚差異，但性別特質與性認同既非男亦非女。他們的共同特徵，在其「生活和行動深受對同性者的真摯友誼或愛情所啓發」。³⁵ 卡本特稱「中性」群的生

33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pp. 21-22.

34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pp. 66-67.

35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8), p. 108.

理男性為「Urning」，生理女性為「Urningin」；他們只對同性所滋生的情愛，則為「Uranian love」。這些性學詞彙，最早出現在奧（後來的德）國作家卡爾·烏利斯(Karl H. Ulrichs, 1825-1895)發表於 1860 年代的一系列《男男情愛之謎》(*The Riddle of "Man-Manly" Love*)小冊。烏利斯用「第三性」(the third sex)來形容「Urning」，卡本特則部分援用前者的理念，但改用「中性」(the intermediate sex)來指涉自己對「Urning」的詮釋。³⁶

對比卡本特的《中性論》與烏利斯的《男男情愛之謎》，尤能凸顯前者的兩大特色，即借男同性戀來挑戰男女性／別框架，以及闡揚同性戀者重要的天賦才能與社會貢獻。兩書最大的共識，在於引證說明同性戀者的性傾向是本能與先天的，因而無法根除；其多數身心發育良好、表現優秀，未見病態跡象，也非人們誤解的退化或異常。³⁷ 在這些共識前提下，卡本特的男男論述在三大方面異於烏利斯的作品：強調自身論述立場客觀；重靈輕肉；凸顯同性戀者的社會價值。首先，相較於烏利斯在著作中以 “We Urnings” 表現自己的同性戀身分，卡本特的作品不曾承認自己同屬他筆下的 “Urnings” 一員。我認為這反映兩人不同的論述策略。烏

36 Karl Heinrich Ulrichs, *The Riddle of "Man-Manly" Love: The Pioneering Work on Male Homosexuality*, Vol. I, trans. by Michael A. Lombardi-Nash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94), pp. 34-41. 由於「Urning」這個字眼在民國時期有不同中文譯法，為避免造成混淆，我在正文只呈現原文。但觀諸《中性論》全書，「Urning」應該被理解或翻譯為「中性男」，「Urningin」則是「中性女」；這兩群人共同組成「中性」(The Intermediate Sex)這個性／別。

37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pp. 22-23, 55.

利斯明顯想爲自己這類男同性戀者發聲，所以表態加入此一群體，抗議異性戀主流權威打壓、醜化與歧視他們。卡本特則想維持客觀的學術立場，向讀者呈現中性的正面本質與樣貌，因此隱晦自己的同性戀者身分。

其次，卡本特旨在彰顯中性有助提升人類愛情的深廣與質量，所以他多次強調這些人的同性關係，首重精神上思想與友誼的情感交流。相對而言，烏利斯注重男男關係的「性行爲」與「肢體接觸」，並聲言男男的自然性慾(sexual drive)應獲得滿足。³⁸ 卡本特強調，中性情感關係的意義不僅只滿足自身的自然慾望，更在於具現愛的真諦。他並解釋由於社會不允許中性自在充分遂其情慾，他們便將慾望導向感情渠道，培養出更深邃豐富的情愛感知力與表達方式。且因中性更懂得珍惜真愛得來不易，並習於控制自身性慾，而較少不忠或性濫交的情形。³⁹

卡本特《中性論》不同於烏利斯著作的第三點，即不僅強調中性的生心理健全與高尚情感關係，更大量著墨於他們促進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烏利斯抗議當權對男同性戀者充滿偏見的壓迫，但他的強勢發言並未奏效。⁴⁰ 相較於烏利斯理直氣壯向當局爭取同性戀的平等公民權，卡本特選擇臚列歷史上屬於中性的各界名人之功業與傑出作品。他希望

38 Karl Heinrich Ulrichs, *The Riddle of "Man-Manly" Love: The Pioneering Work on Male Homosexuality*, Vol. I, pp. 34-41.

39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pp. 67-68.

40 Karl Heinrich Ulrichs, *The Riddle of "Man-Manly" Love: The Pioneering Work on Male Homosexuality*, Vol. I, pp. 34-41; Hubert Kennedy, *Karl Heinrich Ulrichs: Pioneer of the Modern Gay Movement* (San Francisco: Peremptory Publications, 2002), p.61.

藉此證明中性的社會功能與存在價值，以申明即便同性結合無法繁衍後代，他們確能以傑出才能與優異特質裨益社會。

卡本特的人情性學，既展現本於自身經驗的真情流露，又強調有科學憑據與多元脈絡的理性觀察。這種情理並重的精神，既有別於律師出身的烏利斯據理力爭的同性平權呼聲，也不同于赫希菲爾德主要從胚胎醫學等生理發展討論同性戀的自然科學視角。身為醫生的赫希菲爾德，可謂近代歐洲聲援同性平權最力之學者，自身也是未出櫃的同性戀者。他雖極力主張對同性戀除罪化，卻又多次將同性戀等同於像兔唇那樣的「先天畸形」；不同之處，只在兔唇可矯正，同性戀則否。⁴¹ 赫希菲爾德甚至堅持同性戀男女不適合為人父母，聲稱他／她們往往會生出多病的後代。他這類言論，多少讓同性戀與退化仍產生千絲萬縷的關聯。⁴² 相較之下，卡本特除了善用生物醫學與胚胎遺傳學對人類性慾的最新研究成果外，更旁徵博引古今浩瀚的文藝與民族誌實證。卡本特論述同性戀的抒情、感性與溫暖筆調，及所展現的同理心，與其他性學家只在意客觀陳述的科學口吻，尤呈對比。

卡本特為同性戀者打造利己利人的形象之餘，也啓迪世人理解性別流動性的價值與性別寬容的重要性。他廣泛參考歐陸性學新研究、希臘文化等歷史現象、印度宗教與人類學調查，以改變同性情慾被視為文明退化、道德墮落與精神疾病的偏差形象。《中性論》追求精神結合更勝肉體交合的觀

41 Simon LeVay, *Queer Science: The Use and Abuse of Research into Homosexu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pp. 19-21.

42 Kirsten Leng, "Permutations of the Third Sex: Sexology, Subjectivity, and Antimaternalist Femin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igns* 40:1 (Autumn 2014), pp. 227-254.

點，可謂卡本特的自身寫照。他提供給葛理士在《性逆轉》(*Sexual Inversion*)中的性自述，即為明證。⁴³ 卡本特認為，兼具兩性社會特質的中性，可改善男女名曰兩性相輔相成實則互不理解的關係困境。⁴⁴ 中性重視精神靈性的連結，在他看來能砥礪性別道德，培養高尚社會價值，並提升情愛結合的品質。⁴⁵ 卡本特甚至將中性論與當時在歐美勃興的婦女運動，做了思想的連結。他指出正是那群人數漸增、兼具男女性別特質的中性女人，日益不滿社會的諸多桎梏，才導致婦女解放呼聲浪起。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卡本特的人情性學，有著強烈的平等精神。在 19 世紀後期的英國，包括王爾德在內的一群男性文藝菁英，企圖發揮希臘同性戀文化來挑戰異性戀主流。但他們所形構貴族與年輕男孩之間超凡(*transcendental*)的男男情愛論，其間隱含著階級不平等。卡本特的同性性理論，則呼應他提倡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民主精神，展現打破性別差序、突破階級界線與淡化長幼尊卑的平等意識。⁴⁷

43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 Sexual Inversion*, pp. 57-59. 在這個《性逆轉》的版本中，卡本特是「個案 7」(Case VII)。

44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p. 129.

45 Alison Twells, “‘Eros the Great Leveller’: Edward Carpenter, Sexual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orthern Working Man,” *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22:3 (Winter 2021), pp. 1-24.

46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p. 78.

47 Josephine Crawley Quinn and Christopher Brooke, “‘Affection in Education’: Edward Carpenter, John Addington Symonds and the Politics of Greek Lov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7:5 (October 2011), pp. 683-698.

卡本特人情性學的發展歷程，充滿著他本人追尋與實踐自我的痕跡，還有他為與自己性向相投的同志爭取在社會上合理地位的奮鬥印記。但他以男男同性情慾為中心的性理論在 1920 年代初進入中國後，卻出現相當大的文化轉譯與誤解。桑梓蘭曾說明，葛理士在 1900 年後，將著作轉由美國出版社發行，以躲避英國禁止淫穢作品的法律制裁，並獲得國際盛名。她並歸納葛理士的性學著作具有「流通廣」(availability)與「清楚直率」(explicitness)的優勢。⁴⁸ 據此，桑梓蘭推斷葛理士性學著作得以在 1920 年代末逐漸取代卡本特論述，成為中國同性戀的主流論述，不過，若以著作流通程度來看，卡本特不見得居下風。《愛的成年》在美國及歐陸都廣泛發行，並有包括日文、中文在內的多國譯本。至於論述內容上，卡本特對性慾的敘述確實多隱晦含蓄，不如葛理士客觀陳述時的直白露骨。但若就著作的可讀性，則卡本特文筆流暢優美，著作篇幅短，內容也深入淺出。相較之下，葛理士大部頭的《性心理研究》，充斥冗長的學術析論與引述，不見得易於吸收與掌握其概念。節制生育大將山額夫人(Margaret Sanger, 1879-1966)便曾在一口氣讀完《性心理研究》前 6 卷後，「幾個月精神消化不良」(psychic indigestion for months)。⁴⁹ 所以，桑梓蘭這番解釋雖有其立論依據，卻未能完整說明中國論者為何揚棄卡本特的同性戀觀點。以下，我將揭露中國譯介者如何轉譯與挪用他的性理念，來發

48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p. 312. no. 56.

49 Margaret Sanger,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38), pp. 93-94.

揮他們多半已有成見的論點。

二、男女本位文化轉譯：《愛的成年》在中國

卡本特之名及其《愛的成年》，至遲在 1918 年已現身中國，而且是在《新青年》這個揭櫫新文化運動且深具前瞻影響力的月刊上。英文造詣佳的周作人(1885-1967)，讀的應是《愛的成年》英文原著。他在 1918 年 10 月中的《新青年》〈隨感錄(三十四)〉，簡述此書讓他「關於兩性問題，得了許多好教訓，好指導女子解放問題。」⁵⁰ 這篇總共 4 頁的〈隨感錄〉一口氣引用 5、6 位歐美文藝作家的著作，來呼應卡本特的兩個重點。其一，婦女解放的癥結在(尤其生產期間也得有)經濟獨立，而其惟有社會整體變革、制度配套才可能達成。其二，性慾乃人類身體本能，「美善潔淨」，不應被買賣、遮蓋或被教會斥為汙穢。周作人於文末歸結卡本特寫《愛的成年》之宗旨：「他的希望，是在將來社會上，成立一種新理想新生活，能夠以自由與誠實為本，改良兩性的關係。」⁵¹

繼周作人的介紹後，《愛的成年》早期的中譯本，受到日本社會主義相當大的影響。北大學生傅斯年(1896-1950)與羅家倫(1897-1969)等人創辦的《新潮》，在 1919 年 5 月刊載郭須靜(1890-1933)翻譯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1871-

50 周作人，〈隨感錄(三十四)〉，《新青年》(上海)，卷 5 號 4 (1918 年 10 月 15 日)，頁 409-412。

51 周作人，〈隨感錄(三十四)〉，《新青年》(上海)，卷 5 號 4 (1918 年 10 月 15 日)，頁 409-412。

1933)的〈男女關係的進化〉一文。⁵² 此文意譯卡本特《愛的成年》部分內容。同年夏天，郭須靜用筆名「后安／厚庵」在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與《神州日報》，刊載《愛的成年》譯作，可謂第一部較完整中譯連載本。⁵³ 當時，后安的翻譯是據堺利彥的日文版本，〈自由社會及男女關係〉，中文譯名〈男女關係論〉。1920年，北京晨報社出版后安譯作的單行本，為《愛的成年》的首部中譯專書。此書與前一年的《新潮》連載本，有3個不同之處。一是修正了某些翻譯內容，二是補進堺利彥日文版刪掉未譯的第七章〈中性論〉(*The Intermediate Sex*)，三是將標題改回當年周作人譯的《愛的成年》。⁵⁴ 下一篇《愛的成年》中譯本，出現於1920年底，標題為〈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分兩期發表在上海《星期評論》周刊。該篇譯者「哲父」，在譯文前註明此文乃堺利彥「轉述」卡本特《愛的成年》之作。「哲父」並將卡本特此書與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婦女與社會主義》(*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1879, 英文譯為 *Women and Socialism*)，並列為「在社會主義的男女論上面，都是世界上極有價值的著作。」⁵⁵ 譯者此

52 堺利彥著，郭須靜譯，〈男女關係的進化〉，《新潮》(北京)，卷1號5(1919年5月1日)，頁799-806。

53 后安，〈愛的成年：譯序〉，收入嘉本特著，后安譯，《愛的成年》(北京：晨報社，1924，第4版)，頁1-2。郭須靜在《時事新報》上對卡本特《愛的成年》的譯述，是以「厚庵」為筆名。例見 Edward Carpenter 著，厚庵譯述，〈男女關係論 Love's Coming-of-Age〉，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7月9日，第3張，第3版。

54 后安，〈愛的成年：譯序〉，收入嘉本特著，后安譯，《愛的成年》，頁1-2。

55 哲父，〈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一)〉，《星期評論》(上海)，號

番論調，一來解釋《星期評論》這份致力介紹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的報紙刊載該文的背景，二來明確將《愛的成年》定位為「社會主義的男女論」經典之一。以上幾篇《愛的成年》最早的中文譯著，皆受堺利彥所代表的日本社會主義影響，並根據他轉介的濃縮重述版來理解與翻譯該書。例如「哲父」的譯註，不只標舉倍倍爾，也指出卡本特的觀察和主張，「是以女子『經濟的獨立』，為兩性問題解決的前提的。」⁵⁶ 由此觀之，堺利彥意譯的《愛的成年》，確實呈現卡本特在原著所宣揚婦女解放與經濟獨立等社會主義思想。

中國知識分子雖借道日文語境來逐譯《愛的成年》，卻只擇取堺利彥的意譯版本，而忽略如山川菊榮(1890-1980)等社會主義者對卡本特「中性」論的女性主義轉譯。從社會主義的角度而言，堺利彥確實掌握了卡本特重視精神層面的社會主義思維，及其跨越東西方與不同意識形態籬籬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理想。⁵⁷ 然而，堺利彥並未領略卡本特《愛的成年》旨在突破僅從男女關係談論情慾自由的框架。與此相對，山川菊榮與福田英子(1865-1927)等日本菁英女性，則不只接收卡本特的社會改革與女性解放觀，更將他基於男男情慾而發的「中性論」嫁接到女女論述上，為女同性

28 (1919年12月14日)，頁3-4。

56 哲父，〈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一）〉，《星期評論》（上海），號28，頁3。

57 Sarah Frederick, "Yamakawa Kikue and Edward Carpenter: Translation, Affiliation, and Queer Internationalism," in Julia C. Bullock, Ayako Kano, and James Welker, eds., *Rethinking Japanese Feminis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187-204.

愛與獨身女性辯護。⁵⁸ 這些日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企圖挪用卡本特的思想來建構女性的新主體與性認同，藉此豐富男性本位的社會主義。但她們的女性主義思維，顯然並未進入卡本特的中國（全為男性的）譯介者之視線內，因為他們只以堺利彥的譯本為主。堺利彥不但省略未譯〈中性論〉那章，也只把《愛的成年》當成討論男女關係與婦女問題之力作來宣揚。受堺利彥影響的中國進步知青，多承襲他的立論，從社會主義出發來主張婦女解放，以改善男女關係，追求社會進化。

自周作人的〈隨感錄（三十四）〉始，《愛的成年》在中國的譯介便持續在社會主義與異性戀的思想視閫下，被界定為提倡兩性平等與自由婚戀的代表作。周作人簡介的《愛的成年》，宛然一本異性戀的指導書籍。在他的詮釋下，該書有關婦女解放、社會改革，以及正面接受性慾等論點，都是以改良兩性關係為目標而倡。許維安對近代女同性戀論述的研究，集中比較《愛的成年》在 1920 年代中國 4 個譯介版本的標題。她也細心討論了這些中譯本分別以「同性戀愛」、「同性愛」與「中性」等字眼對應原書「urning」、「uranian」和「the intermediate sex」的翻譯策略。許維安指出兩個現象，一是 4 家出版社的「書商與譯者在書名中強調戀愛的內涵」，都「將加本特與《愛的成年》放在異性戀的戀愛議題之中理解」；二是那些「中性」的中文譯詞既不

58 Michiko Suzuki, "The Translation of Edward Carpenter's *The Intermediate Sex*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Heike Bauer ed., *Sexology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ncounters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pp. 197-215.

統一且意涵歧異，因而「分散了〔原書為同性戀〕去病化的力道」。⁵⁹ 我同意許維安的觀察，但她還未釐清中譯者為何與如何在譯本中呈現其異性戀思維。事實上，《愛的成年》不少行文具有打破「兩性」關係框架，開啓情慾流動的意圖，而這些內容多被中譯者有意無意忽略或誤譯。我認為，考察四家中譯本如何逐譯這類行文，才能真正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清楚揭示這些中譯者出於男女本位意識來理解與詮釋原典。以下，本節將分析幾個《愛的成年》中譯本置換或省略卡本特原書某些字詞與段落的案例。藉此，我將闡明中國社會如何窄化卡本特提倡人類情慾應適「性」發展的民主信念，讓該書變身為與愛倫凱作品幾無二致的異性戀名著。

首先，《愛的成年》幾位中譯者都不約而同使用「男女」或「兩性」，來翻譯書中未限定於男女關係或情感的「human」、「people」或「sex」等中性字眼。此類或許多半無意識的譯法，特別透露出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受異性戀思維的制約。

《愛的成年》第八章——即周作人認定卡本特議論「兩性關係」的那章——開頭前兩句的各家中譯，即為佳例。1923年，當時就讀復旦大學商科三年級的郭昭熙，以筆名「海燕」，將該書改名為〈戀愛論〉，從該年10月到隔年4月連載於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報》。⁶⁰ 此文乃首篇根據《愛

59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23），頁97-99、116。

60 〈大學二年級商科：郭昭熙（照片）〉《復旦年刊》（上海），卷4（1922年），頁82。關於「海燕」的本名乃郭昭熙，可從陳望道日後在該文出單行本的序言得知。陳望道，〈陳序〉，收入卡本忒著，郭昭熙譯，《愛的成年》（上海：大江書鋪，1930，再版），頁I-II。例見（英）嘉本特著，海燕譯，〈戀愛論〉，《民國日報·婦女週報》，期11（1923年10月31日），頁2-3。

的成年》英文原典向中文讀者呈現全書內容者。此前兩個月，海燕曾先翻譯《愛的成年》第一章「性慾」(The Sex-Passion)，刊登於《婦女週報》(1923-1926)的前身《婦女評論》(1921-1923)。⁶¹ 此二周刊，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左派男女知識菁英討論婦女運動應朝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走向的重要刊物，也屬廣義的社會主義媒介。海燕如此翻譯《愛的成年》第八章開頭前兩句：（以下原文與各家譯文對照重點處，我加畫底線凸顯）

最後，我想對於人類兩性關係底全體，下一點總括的批評。(TAKING, finally, a somewhat wider outlook over the whole subject of the most intimate human relations than was feasible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s, we may make a few general remarks.)

兩性關係難得普遍瞭解的一個重大原因，我們前已說及，就在人在性的方面，感情與資質都太懸隔。(One of the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arriving at any general understanding on questions of sex—and one which we have already had occasion to note—is the extraordinary diversity of feeling and temperament which exists in these matters.)⁶²

由后安所譯晨報社完整版《愛的成年》(1920)，對以上兩

61 嘉本特著，海燕譯，〈戀愛論〉，《民國日報·婦女評論》（上海），期 102（1923 年 8 月 1 日），頁 1-2。

62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p. 135；嘉本特著，海燕譯，〈戀愛論（原名「戀愛成年」）：第八章、自由的社會〉，《民國日報·婦女週報》（上海），號 32（1924 年 4 月 2 日），頁 4。

句原文的翻譯則是：「這是我書臨終的一章，我在這裏講講人類男女的關係全體的概念罷。」「講兩性的問題，原來很難尋出一致的論點。那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於性的問題，各人的感情氣質差別甚大。」⁶³ 此外，新聞學家任白濤(1890-1952)以「BT生」的筆名，將《愛的成年》譯為〈戀愛之理想境〉，連載於1924年春的上海《民鐸雜誌》(1916-1931)。任白濤在文前的譯註表示：「本文雖不敢說是極精當的意譯；但至少可以相信不失一些的原意。」⁶⁴ 然而，任白濤對第八章第一句也出現類似海燕與后安的譯筆：「最後更述說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以補在前各章所未講」。他甚至對接下來第二句，以及原書第七章〈中性〉全文，都省略未譯。⁶⁵ 看來，《愛的成年》任譯本，不論稍早的刊物連載版或1927年出專書版，其失去的原意尚不只「一些」。⁶⁶

時隔1年，《民鐸雜誌》這份由學術研究會主編、以宣揚民主與個性解放為宗旨的刊物，又登載樊仲雲(1898-1989)再譯《愛的成年》的新版本，標題改為〈戀愛的成熟〉。樊仲雲曾留日且為文學研究會成員，1920年代先後擔任過商務印書館與新生命書局編輯，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樊仲雲的說明，他對先前幾個中譯本都有意見，並指出后安轉譯自

63 嘉本特著，后安譯，《愛的成年》（北京：晨報社，1924，第4版），頁87-88。

64 卡本特著，BT生譯，〈戀愛之理想境〉，《民鐸雜誌》（上海），卷5號2（1924年4月），頁32。

65 卡本特著，BT生譯，〈戀愛之理想境〉，《民鐸雜誌》（上海），卷5號2（1924年4月），頁32。

66 任白濤輯譯，《近代戀愛名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此書第一章即〈戀愛之理想境〉全文。

日文的版本有諸多錯誤，因此認為「仍有再譯的必要。」⁶⁷ 樊的譯本分 3 次刊出，前兩次日期（分爲 1925 年 5 月、1926 年 3 月及 5 月）不知何故竟間隔近 1 年。樊雖批評后安的譯本與原文多處「大相逕庭」，卻同樣帶著異性戀的有色眼鏡來逐譯《愛的成年》。且看他翻譯該書第八章前兩句：「最後，我們要以更廣大的眼光，觀察最密切的男女關係的全體，把前面幾章所不能盡的，稍許加以一點批評。」「關於兩性問題，我們所以不能有一般的理解者，其最大的一個困難——我們在前面所業已講過的——便是其間的感情與性質，常因人而有甚大的不同。」⁶⁸

由上可知，4 位《愛的成年》中譯者，不謀而合地將卡本特原書討論各種性別的人類性慾問題，固定爲男女間的兩性關係。顯然，對這些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所認知的「正常」人類性慾或性關係，只限於男女之間的異性互動。1929 年，由留日學者兼中共黨員陳望道(1891-1977)在上海創辦的大江書鋪，發行了 6 年前郭昭熙（海燕）連載於陳所主編《婦女週報》譯文的單行本，並將原標題〈戀愛論〉更名為《愛的成年》。陳望道的序中稱讚此書「富於情味而又思想不陳腐」，是他讀過許多兩性與婦女問題書籍，印象最深的其中一本。⁶⁹ 陳並將《愛的成年》與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

67 卡本特著，樊仲雲譯，〈戀愛的成熟〉，《民鐸雜誌》，卷 6 號 5（1925 年 5 月 1 日），頁 1-37。

68 卡本特著，樊仲雲譯，〈戀愛的成熟〉，《民鐸雜誌》，卷 7 號 5（1926 年 5 月），頁 1。

69 陳望道，〈陳序〉，收入卡本忒著，郭昭熙譯，《愛的成年》，頁 I-II。

並尊為「世界婦女論底雙璧」。⁷⁰ 此一定位，再次凸顯自周作人以來，由思想進步或左傾知識分子引領的上海與北京出版界，只由男女情愛的視角介紹或詮釋《愛的成年》。

其次，這些中譯者忽略或誤解卡本特為中性者鳴不平的某些行文，由此暴露出他們的「性取向盲」，即內化了異性戀思維而未意識到有其他性認同的可能。的確，海燕、后安的單行本，以及樊仲雲的《民鐸》與專書版都翻譯了原書的第七章〈中性（論）〉。但這既無法證明譯者認同卡本特的中性論，更不表示譯者正確接收或傳達原書挑戰男女情慾範式的訊息。例如，后安在出版《愛的成年》單行本時，說明他加入日文版未譯的第七章，「以復原書八章之舊觀」。⁷¹ 這說明后安更多是出於尊重著作的完整，而非因認可中性論才翻譯原書第七章。

此外，這些中譯者對《愛的成年》其他章內容的誤譯，則進一步暴露他們的異性戀本位思維。一個重要例證，是卡本特在第八章第二段代中性者發抒不滿的文字。在這一長段中，卡本特先用本節上述縮排引文的第二句話闡明此段要點，亦即人類豐富歧異的情感與性格，導致性慾的表現方式多元，難以被簡單歸結理解。他認為男女長期以來，受社會制約而發展出迥然不同的情慾表達方式，彼此難以互相了解。接著，他表示不論男女皆未能瞭解每個社會中，都有一類數量可觀之人（即中性）生來只將情慾投向與自己同性者。

70 〈愛的成年（廣告）〉，《文藝研究》（上海），卷1（1930年2月），頁235。

71 嘉本特著，后安譯，《愛的成年》，頁1-2。另見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82。

卡本特在此段末感嘆社會不僅忽略或不承認這些中性的存在，也對其缺乏公正深入的探究，來了解中性與男女兩性的重要差異。海燕的 1924 年《婦女週報》連載版，顯然未正確理解卡本特這段話的重點，因此譯筆顯得不知所云：

兩方面〔原文指男女兩性〕都對於別一半分於本性有著天賦之愛的人類即異性〔原文描述的是中性〕，完全不相瞭解，雖然同為任何社會中重大而且重要的一面〔原文描述中性群體〕，卻幾乎不認其存在。（底線為筆者所加，六角括號內為筆者注）⁷²

至於任白濤有自信掌握《愛的成年》原意的版本，則乾脆把上面那段原文整個刪除未譯。任白濤也基於他自稱「精當的意譯」，沒有譯出卡本特在第一章末尾處數頁強調性慾的宗旨首在與相愛之人結合、次之始為繁衍後代的原文。⁷³任白濤在譯序中，曾說明他對《愛的成年》中「繁複和不必要之處，當然剔去」。⁷⁴他選擇放棄翻譯第七章〈中性〉，並逕行跳過數頁或幾段攸關卡本特同性戀理念的原文不譯，顯示他認定這些部分「不必要」介紹給中國讀者。無獨有偶，后安所譯的單行本，雖然補齊了第七章，卻跟任譯版同樣省略卡本特第一章末尾處那部分。⁷⁵樊仲雲與后安的單行本，則譯出了這部分內容，但他倆也未能免於從「兩性」與「男

72 嘉本特著，海燕譯，〈譯著：戀愛論（原名「戀愛成年」）：第八章、自由的社會〉，頁 4。

73 卡本特書中第一章被任白濤省略未譯的那部分，見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pp. 20-24.

74 卡本特著，BT 生譯，〈戀愛之理想境〉，《民鐸雜誌》（上海），卷 5 號 2（1924 年 4 月），頁 1。

75 嘉本特著，后安譯，《愛的成年》，頁 13。

女」的單一視角理解該書所談的性慾情感問題。

就這樣，《愛的成年》在1920年代中國被轉譯成一本論述新社會理想兩性關係的外國名著。該書的幾位男性中譯者，聯手封殺了卡本特在書中宣揚多元性慾／認同的理念。他們不論是頌揚《愛的成年》為「社會主義的男女論」或「世界婦女論」代表作，都明顯抹消此書為同性情慾發聲辯護的重要性。從幾位中譯者或出版者的附註與序言，看不出其譯本加入第七章與他們認同中性論有任何關連，頂多只顯示他們尊重原書完整性的學術考量。本節所做的原典譯本的字詞對照，揭露中國新知識分子如何出於男女本位意識來理解《愛的成年》。這些中國新男性的性／別意識前提，決定了他們怎麼接受與轉譯《愛的成年》。以下兩節，將聚焦於卡本特《中性論》的中文譯介，以進一步分析為同性愛正名辯護的中性論，如何在異性戀論述與科學性學的夾攻下腹背受敵，而淡出中文出版界。

三、卡本特中性論的中文譯介（一）： 「第三性」論述的干擾

卡本特的作品，顯然並非在思想真空狀態進入中國；同時期其他相關著述的出版，都可能影響甚至支配中國人看待他的論見。若欲掌握卡本特的中性論在民初的思想傳播過程，必須將之置於當時中國關於婚戀與性別課題的論述場域來探究。惟有較宏觀考察當時中國情慾論述的發展走向，才能更清楚理解時人如何接受卡本特鼓吹同性愛的中性論。

卡本特的《中性論》進入中國語境的時間點是1920年，

不論那是《愛的成年》包含第七章的中譯本，或是現身報章期刊的單篇論文。⁷⁶ 該年 8 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婦女雜誌》(1915-1931)，在「名著」專欄刊出第一篇卡本特〈中性論〉的中譯本。署名正聲的譯者，說明其翻譯動機：「中性在兩性問題中已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英國詩人社會主義者 Edward Carpenter 曾著一書名曰 *The Intermediate Sex* 為現代研究中性重要著作，前譯其一、二兩章，或者也能引起各方面研究的性味啊！」⁷⁷ 正聲之所以認定中性問題「極重要」，應與當時普遍設立的新式學校陸續出現學生間同性愛的現象，密切相關。早在 1912 年，署名善哉的作者便在上海《婦女時報》指出當時女學生流行「同性之戀愛」。⁷⁸ 輿論逐漸關注青春期情竇初開的學生，透過報刊小說初識自由婚戀，卻因學校與住宿環境缺乏異性，而轉與同窗好友展開同性愛的關係。無獨有偶，稍早同年 3 月，《婦女雜誌》刊出愛倫凱〈愛情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 1911)的節譯本，當中出現「第三性」(the third sex)的字眼，指涉有別於純粹女性的性別特質。⁷⁹ 有鑑於「第三性」與「中性論」共同出現於 1920 年的《婦女雜誌》，對此二者進行並置分析，或許能解釋中國西化知識界如何接受「中性」。

76 〈中性論〉同時收錄於《愛的成年》及《中性論》。此外，《中性論》還收錄第一章導言，與另外“The Homogenic Attachment”、“Affection in Education”及“The Place of the Uranian in Society”3 章。

77 Edward Carpenter 著，正聲譯，〈中性論〉，《婦女雜誌》(上海)，卷 6 期 8 (1920 年 8 月)，頁 1-14。

78 善哉，〈婦女同性之愛情〉，《婦女時報》(上海)，期 7 (1912 年 7 月)，頁 36-38。

79 四珍，〈愛情與結婚〉，《婦女雜誌》(上海)，卷 6 號 3 (1920 年 3 月)，頁 1-12。四珍即沈雁冰。

近代中國譯者與出版商不論出於接受新知或市場考量，顯然都更青睞《愛的成年》，而非《中性論》。《中性論》在中國的譯介沒有完整的專書版，書中各章的中譯本只散見於幾分報刊，確如許維安所言「非常零散、沒有系統的進行翻譯和傳播」。⁸⁰ 若考察近代中國譯介外國婚戀作品的過程，則可發現足以影響中性論在中國發展的兩種情況。一是異性婚戀新思想的外國著作比《中性論》更早進入中國，主導時人挑戰傳統、再造兩性關係的方向。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與《群鬼》(*Ghosts*)等劇作，以及愛倫凱的《愛情與結婚》，在1910年代先後啓發中國進步知青批判雙重性道德並高唱戀愛神聖。這些論述，都基於男女的異性婚戀思維而發，並與同樣來自西方的優生觀在1920年代完美接榫。⁸¹ 二是當卡本特的作品進入中國後，經常被歸為像易卜生、愛倫凱那般提倡兩性平等與自由婚戀的思想。此兩種情況，大致顯示當時中國啓蒙分子已普遍形成共識，從男女二軸來重塑婚戀與兩性關係。這樣的推論，有助於說明我從史料發現的兩個現象：一是當時中國對卡本特的中性論只純粹翻譯，卻鮮少推介；二是不少論者引用《愛的成年》來宣揚兩性婚戀理想與男女平等關係。

本節將以愛倫凱式的「第三性」概念之譯介為對照，來理解五四後的中國西化知識分子如何接受與認知中性論。我將論證時人建構起以男女為「性化主體」(the sexed subject)

80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100。

81 Sakamoto Hiroko, "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 i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2:2 (Fall 2004), pp. 329-376.

的現代異性婚戀範式，排擠了卡本特超越兩性框架的中性論，而偏重他在《愛的成年》描摹未來理想婚姻與女性解放的言論。白露、宋少鵬、桑梓蘭與姜學豪等中外學者的研究，已陸續闡明中國在 1920 年代前後輸入各種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並以此開展兩性關係新典範。其中尤為關鍵的，是知識分子援用西方性學，發展出「女性」（以及相應的「男性」）這個具有進化觀、生物醫學意涵、中產階級意識與個人主體認同的概念。綜合白露與宋少鵬的說法，女性作為「性化主體」，展現出中國女人的性慾 (sexuality)、生理特徵 (physiological traits) 與個體性 (individuality)。這些特質，基本不存在於儒家的性別與人倫秩序中。⁸² 桑梓蘭的專書從圍繞女性情慾的言論出發，闡述中國在五四後的「性慾崛起」 (the rise of sexuality)。⁸³ 姜學豪的研究，則顯示當時中國初現不同於傳統的現代「性認同」 (sexual identity) 與情慾知識。⁸⁴ 女性、性意識與性慾概念，開始頻繁出現於中國醫學、教育與社會各界對兩性特質與性別關係的論述中。這是卡本特的中性論進入中國的思想背景。無巧不巧，愛倫凱的自由婚戀學說及被轉譯為極具負面意味的「第三性」概念，正以更高的聲勢橫掃進步女性報刊。「第三性」可上溯自柏拉圖對原始時代人類本性的描述，較晚近則被烏利斯用來形容無法被歸

82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pp. 52-56, 64-126; 宋少鵬, 〈清末民初“女性”觀念的建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期 5 (2012 年), 頁 102-116。

83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p. 275.

84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p. 6.

類為男性或女性之人。⁸⁵ 但是，1920 年之後中國報刊中所見的「第三性」，清一色為衍伸或轉譯自愛倫凱對該詞彙的詮釋。以下我將闡述，「第三性」凌駕「中性論」的論述氣勢，不只反映當時中國正匯聚的異性戀範式影響力，也引導論者從兩性而非中性的視角出發，來引介卡本特的學理。

愛倫凱對「第三性」的闡述，並未批評同性情慾；她的中國男性追隨者卻賦予「第三性」只指涉生理女性且相當不堪的意涵，連帶也讓「中性」沾染負面色彩。愛倫凱將「第三性」詮釋為某些女人因未能理解戀愛真諦與自身的性慾命運(*sexual destiny*)，而發展出的性格。⁸⁶ 但她也曾在提及某些思想與意志強烈的單身女性成為「第三性」時，形容她們「精力充沛、聰明、工作快樂、冷靜但穩健。」⁸⁷ 相較之下，《婦女雜誌》的主要作者群明顯對不符主流女性氣質的「第三性」充滿焦慮。他們出於男性本位的異性戀思維，用「不男不女」以至「變態女性」的字眼，來詮釋愛倫凱較溫和的「第三性」概念。這類男性論述，將那些放棄為人妻母角色的單身或職業女性，貶為缺乏純正女性特質的「第三性」，損其為「男性化的女子」、「女性被個人性所抑壓，而發生所謂第三性化的婦女」。⁸⁸ 這類第三性論述雖鎖定女性，卻意在貶斥男女雙軸之外的性／別特質，因而不利中性論的傳播。

85 Hubert Kennedy, *Karl Heinrich Ulrichs: Pioneer of the Modern Gay Movement*, pp. 59-66.

86 Ellen Key, *Love and Marriage*, trans. by Arthur G. Chater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1), p. 187.

87 Ellen Key, *The Woman Movement*, trans. by Mamah Bouton Borthwick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2), pp. 75-76.

88 瑟廬，〈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婦女雜誌》（上海），卷7號2（1921年2月），頁21-27。

此外，連張競生這位曾與《婦女雜誌》主編群打過筆戰的「性博士」，也加入批判「不男不女」特質的性／別論述，而多少阻礙了中性論的傳播。⁸⁹ 張競生主編的《新文化》，充斥著對卡本特超越兩性氣質的「中性」概念抱持敵意的議論。張競生在〈性美〉一文，多次用「男不男女不女」的字眼來貶抑中國男女的生理性徵、性別氣質及性慾能力，並以之為中國羸弱不振（落後西方）的主因。他以優生學結合其自創的性美學，斷言惟有「熱烈的性慾」才得拯救「在娘胞裏已經醜了」的中國男女，並矯治其「兩性倒裝的身體」，以便重塑中國「男即是男，女便是女的人種」。⁹⁰

張競生受西方性學啟發而獨出心裁的性美學，特別具現巴特勒指稱由「性——性別——性慾」(sex-gender-sexuality)三元系統交互運作而形構出的「異性戀範式」機制。⁹¹ 張競生在〈性美〉文首，開宗明義表示：「我擬此後在本雜誌上陸續討論性美與性愛二個問題。每問題皆分為三項——生理——心理——社會——去討論，而以我國的事實為主。」⁹²

〈性美〉這段宣言揭露張競生的宏圖，即以葛理士所代表的西方性學意識形態為摹本，為中國社會打造以優生進化為目標的異性婚戀範式。張競生整合性慾的生理、心理與社

89 關於此筆戰的來龍去脈，見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6（2008年12月），頁29-92。

90 張競生，〈性美〉，《新文化》（上海），卷1號6（1927年11月），頁1-12。

91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9, 194.

92 張競生，〈性美〉，《新文化》（上海），卷1號6（1927年11月），頁1。

會特質而建立的異性婚戀論述，是以「純粹的男性與女性」為主體而展開。卡本特的中性論，在《新文化》凸顯「兩性分明」的性／別特質且批判同性情慾的性話語中，全無存在餘地。

上述這些撻伐「第三性」的兩性論述，顯然比中性論更加強勢，且由1920年代一路延續到1940年代。1941年由教育總署編審會所著的《高中女子修身（第三冊）》第七課「母性」，竟出現類似章錫琛廿年前批判「第三性」的內容。該課文舉愛倫凱來彰顯「母性尊嚴」的重要性，並寫道女子：「只知模倣男子 而蔑視了母性的尊嚴 其結果必生出一種不男不女的中性——所謂第三性的變態女性——這決不是可喜的事。」⁹³（空格乃依照原文）

《婦女雜誌》作為刊登過〈中性論〉譯文卻不斷批判「第三性」的重要刊物，其譯介新思潮的擇取論述策略，透露中性論在中國的傳播困境。該刊在主編章錫琛與周建人的主導下發展出一種論述趨勢，即形式上允許各作者暢所欲言，實則有心建立一家之言。章、周都看似開明公允介紹外國對性慾、婚戀與女權主題立場互異的各家學理，但他們自己的論述，則流露「男性本位的母性主義」思維。⁹⁴ 正聲所譯的卡本特〈中性論〉雖得以刊載於《婦女雜誌》，但主編群對中性論實抱持著「不回應也不傳播」的冷態度。一方面，章錫琛等主要作者持續貶斥「第三性」不男不女。其他作者偶涉

93 教育總署編審會著，《高中女子修身（第三冊）》（北京：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41），頁55。

94 許慧琦，〈愛倫凱在中國：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37（2021年6月），頁1-69。

同性愛主題時，都以異性戀的男性立場加以批評，並提出男女社交或改良家庭等穩固兩性分工秩序以爲解決之道。⁹⁵ 另一方面，《婦女雜誌》仍不時出現提及介紹卡本特的文章，卻都只徵引他對婦女解放或理想婚姻等屬於「兩性」課題的立論。該雜誌唯一唱和「中性論」之作，是日本作家古屋登代子所著，薇生翻譯的〈同性愛在女子教育上的新意義〉（1925）。該文讚揚卡本特賦予同性愛培養細緻情感與擴展社交等正面意義，甚至在文末提及「中性人的顯現」，以解釋崇高的同性愛爲何成爲「現代文明的特徵」。不過，古屋登代子透過師生間與學生相互的關係宣揚同性愛的教育效果，卻在兩個關鍵點上，有別於卡本特的中性論。一是她強調此種愛純靈無肉，二是她認爲此種同性愛不應禁止，但也「不該獎勵」。⁹⁶ 古屋論文，顯然沒有完整與正確傳達卡本特的中性論。《婦女雜誌》對中性論的類似冷處理，也出現在《教育雜誌》。《教育雜誌》只刊載過左翼知青沈澤民（1900-1933）所譯卡本特的〈同性愛與教育〉（《中性論》第四章），卻未見其他介紹或呼應中性論的文章。誠然，沈澤民在該文末註中，附和卡本特批評英國學校的「陰溝方法」，即壓抑同性愛卻漠視學生情慾問題。然而，沈認爲中國應予提倡的「情感教育」，也不盡然是卡本特所欲肯定同性愛的教育。⁹⁷

綜上可知，中性論在中國的傳播，可謂先天不足、後天

95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41-85。

96 日本古屋登代子著，薇生譯，〈同性愛在女子教育上的新意義〉，《婦女雜誌》，卷11號6（1925年6月），頁1064-1069。

97 卡賓塔原著，沈澤民譯，〈同性愛與教育〉，《教育雜誌》（上海），卷15期8（1923年8月），頁1-10。

失調；其面對較早形成且氣勢強盛的異性戀論述，顯得勢單力薄。自清末已逐漸出現的自由婚戀思想，清一色以男女關係為核心。五四及其後，知識分子普遍敵視「不男不女」性別特質，宣揚愛倫凱那類主張女人做好女人、男人做好男人的兩性思想。學者陳靜梅曾指出，1920年代像《婦女雜誌》或《教育雜誌》等暢銷刊物「力圖兼顧市場走向與傳播學理」，較能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論述場域，因而「使人們並沒有立即把同性戀當作需要醫治的對象」。⁹⁸ 陳的論點雖有其道理，卻忽略市場走向（或編輯偏好）與傳播學理之間的分量輕重，可能導致像中性論這類新知，因缺乏後續介紹與援用而顯弱勢，難以在中國生根發展。1920年以降持續被污名化的「第三性」論述，更相對壓縮了中性論的傳播空間。

四、卡本特中性論的中文譯介（二）： 《同性愛問題討論集》及其他

1920年代末，中性論因受異性戀本位的「第三性」等論述強勢干擾，未能廣受青睞、行將退場之際，竟展露一線生機。一名仰慕卡本特的左傾知青胡秋原，在1929年密集發表卡本特的作品譯文、辯護文與悼文，成為最致力發揚中性論來捍衛同性愛的中國作者。⁹⁹ 享壽94歲的胡秋原，曾數

98 陳靜梅，《現代中國同性戀愛話語譯介及小說文本解讀》，頁75-76。

99 胡秋原所譯卡本特作品，見卡本特著，秋原譯，〈同性戀愛論〉，《新女性》（上海），卷4期4（1929年4月），頁513-533；卡本特著，秋原譯，〈同性戀愛論（續）〉，《新女性》（上海），卷4期5（1929年5月），頁605-622。

度依違於國共兩黨，在 1930 年代初主張過「第三種人」的文藝路線，學治中西，著作等身。¹⁰⁰ 胡在未屆弱冠之年，便已「讀完了當時所有的中文社會科學書籍」以及眾多英文文藝哲思作品。¹⁰¹ 他不只遍讀卡本特多部著作，還參考有關卡本特的英文評述專書。胡畢生參加多次論戰，最早一次是在 1929 年以長達 165 頁的論文〈同性愛的研究〉，力抗楊慶堃稍早於上海《北新》半月刊發表的〈同性愛的問題〉，那時胡年僅 19。胡楊二人並未繼續透過文字交鋒，但上海北新書局敏銳嗅出商機，迅於隔年初將兩篇文章集結成單行本，以《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之名發行。此書才經 1 月便即再版，可知確實引起讀者興趣。1929 年秋，胡秋原在他視為「蒙師」般的卡本特過世後一周內，完成〈新故的卡本特〉一文，發表於《北新》。這篇長達 40 頁的追思文，堪謂最全面掌握卡本特思想的中文著作。在文中，胡秋原將卡本特思想綜歸為「卡本特主義」。雖然該年前後還有樊仲雲與中共黨員高爾柏(1901-1986)等人譯介過卡本特的中性論，但胡秋原的闡述最具深度與力道。¹⁰²

本節將聚焦《同性愛問題討論集》再現的中性論，以修正補充前人研究，並結合〈新故的卡本特〉，綜合闡述胡秋原如何評介「卡本特主義」的整體思想。我的論點有二：一、

100 張淑菡，《胡秋原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01 胡秋原，〈作家自傳：胡秋原自記〉，《讀書雜誌》（上海），卷 3 期 1（1933 年 2 月），頁 27-33。

102 樊仲雲自 1927 年 4 月在《新女性》月刊連發三篇卡本特的譯作，但皆無關乎中性論。1928 年，樊收錄這些譯作，以《加本特戀愛論》為題，由開明書店出版。高爾柏以筆名「郭真」所撰的《戀愛論 ABC》，則客觀概述卡本特的「同性愛」思想，未予任何主觀評斷。郭真，《戀愛論 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頁 50-67。

楊文與胡文，分別援用歐陸科學性學與卡本特人情性學來評估同性愛。二、胡秋原的作品雖呈現出卡本特的人情性學精髓，卻仍存在文化轉譯的痕跡。

我想先釐清，楊憂天所引的「Urnige」概念是較早的烏利斯德文版本，而且楊文的理論基礎是科學性學，其恰與卡本特的人情性學相對立。楊的〈同性愛的問題〉，乃以生物演化論為基礎，擇取眾多歐陸性學家的研究成果，而推演出反同性愛的論點。¹⁰³ 楊文根據達爾文《動植物變遷論》的學理，依所有生物與人類「所含底雌雄兩性分」特別發達的性質，來劃分人類為男女兩性。¹⁰⁴ 他在此基礎上，援用科學性學所仰賴的生物學（即楊文所謂「個體發生」(Ontogeny)與「系統發生」(Phylogeny)等）和生心理醫學，分析同性愛的發生及其種類。整體而言，楊憂天認為人人都是天生各有不同程度男女特質的「複性」，亦即在「本性」之外，還有「副性」（或「潛伏性」）。他引用埃賓的著作，將「副性」稱為「異性化的性分」(antipathic sexuality)，意指本性的變形。¹⁰⁵ 他並參照德國性學家亞爾伯特·摩爾(Albert Moll, 1862-1939)的分期論，將一般人「性的人格」——即「對於異性具

103 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pp. 43-46.

104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頁10。

105 值得注意的是，楊憂天的文中所用的「異性（化）」，其實多半指的是「antipathic」，亦即反轉倒錯，而非（在兩性框架中）不同於自己的另一個性別(heterosexual)，雖然他文中也用過後者這個「異性」概念。雖然他用「異性」來指涉這兩種意義差別甚大的概念，但若仔細爬梳其行文脈絡，還是能搞清他怎麼交相使用兩種不同概念的「異性」詞彙。

有性的感覺即性交力的意思」——分成小兒期、無差別期與差別期三個發展階段。¹⁰⁶ 根據楊憂天，正常「性的人格」會從無差別期順利過渡到以異性為愛慾對象的差別期。同性愛，便是人體內由於生殖器、精神或腦「發生障礙」，或因外在因素刺激，導致其「副性興奮」，取代退化了的本性，進而出現愛戀或渴求同性的結果。換言之，同性愛是人類先天（隔代）遺傳的潛伏「副性」過於發達，替換正常「本性」的「不自然的性的感情」。¹⁰⁷ 楊憂天秉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認定同性愛是人類退化的表現，亟需矯正與防治，否則人類種族與社會文明的未來都將遭受威脅。

楊憂天與胡秋原皆視同性愛為先天遺傳，也都接受當時歐洲性學出現的複性說(theory of human bisexuality)，卻因依據不同性學思想而對同性愛做出截然不同的評斷。複性說在 20 世紀初的德語性學界頗流行，尤以奧圖·魏凌格(Otto Weininger, 1880-1903) 出版於 1903 年的《性與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為代表。魏凌格擴展之前性學家已認同人類有男、女及中性的觀點，將性別視為一個由雌雄雙性組成的連續體。¹⁰⁸ 魏凌格的複性說主張人人的生理、心理都是以不同的男女比例元素組成的混和體，從而承認了中性存在的某種正當性。¹⁰⁹ 卡本特的《中性論》進入正文前，便

106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 14。

107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 8-20。

108 Otto Weininger, *Sex and Characte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6), pp. 5-10.

109 Misha Kavka, "The 'Alluring Abyss of Nothingness': Misogyny and (Male) Hysteria in Otto Weininger," *New German Critique* 66 (Autumn 1995), pp. 123-145.

引用魏凌格一段話作為楔子。這段話表示從金屬、植物、動物到人類，都存在一系列的過渡型態。¹¹⁰ 話是如此，從複性說出發詮釋的人類情慾發展，卻不盡然對同性戀持正面態度。魏凌格雖認為同性戀既非病態也非退化，卻堅持男女生殖器的互補特質是人類性吸引力法則的唯一基礎。¹¹¹ 簡言之，他認定性慾結合只存在於異性相吸。所以，例如女性化的男同性戀者，只能以尋找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做為結合對象，來治療其異常的性格與性慾。¹¹² 而楊憂天與胡秋原的文章雖也都引述魏凌格的理論，卻只把複性說當前提來強化自己對同性愛想表達的觀點。楊憂天便一方面指出「男女發生之始，實在各各都具有兩性」，另一方面又如上所述強調同性戀是副性壓過（異性戀）本性，因此是變態逆轉。¹¹³ 楊憑藉歐陸性學，以男女為性別兩軸來審視所有人類的性表現，界定並分殊正常與異常，並由此發展同性愛的病理論述。相較之下，胡秋原在同樣承認「無論何人，都是男女兩性的混血兒」，以此為中性正名之餘，更論辯中性的同性情慾實屬本能且健全。¹¹⁴ 胡的〈同性愛的研究〉，雖介紹不少西方性學家，但文章結構、論點與寫作風格都仿效《中性論》，且大量徵引卡本特多部著作。如說胡文實乃闡述卡本特一家之言，並不為過。

110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no page number.

111 Misha Kavka, "The 'Alluring Abyss of Nothingness': Misogyny and (Male) Hysteria in Otto Weininger," *New German Critique* 66 (Autumn 1995), pp. 123-145.

112 Otto Weininger, *Sex and Character*, pp. 51.

113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11。

114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58。

若從姜學豪詮釋的「知識論現代性」來考察，胡秋原可謂嘗試發揚卡本特的人情性學，來宣稱一種超越科學性學的「新性學真理」。在胡秋原的詮釋下，卡本特的人情性學不僅具備醫學臨床分析，更有人類學、社會學、文學與史學等人社研究成果支持。胡秋原認同卡本特對現代科學褒理性貶情感的批判。胡表示：「僅僅知道拿六〇六來對付花柳病的醫學博士們，將人間一切比較幽微的感情付託他們去處理，總是一件可怕的事。」¹¹⁵ 胡秋原追隨卡本特，主張同性愛的課題應從具有歷史縱深的人類文化與社會經驗出發來掌握理解，才能較全面而不偏狹。

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愛的研究〉作為演繹卡本特中性論最力之中文作品，卻刻意過度發揮「中性重靈輕肉」的論點，而展現出胡秋原因地制宜的文化轉譯。胡秋原將同性之情愛與性慾涇渭分明區隔開，強調「同性愛」是中性男女發乎天性的深刻精神結合，完全不同於「同性交」那種他名為「荒淫縱慾」者純肉慾的交合。¹¹⁶ 這既是胡秋原回應民國社會讚頌異性戀而譴責同性愛的矯正策略，也是他個人對卡本特思想的獨特詮釋。胡秋原寫〈同性愛的研究〉之時，是個胸有大志、不滿現實且缺乏戀愛經驗的 19 歲知青。他對同性愛的理解除受卡本特啟發之外，還出於自身社會主義思想與抗議社會偏見之心。¹¹⁷ 胡秋原不滿民國輿論不明就裡，逕

115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 52、198-199。

116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 70。

117 胡秋原是在 1930 年底，經王禮錫、陸晶清夫婦介紹，開始與他後來的妻子敬幼如通信。根據胡秋原的晚輩張漱菡為前者做的傳記，當時陸晶清問胡秋原是否有女朋友，胡回答他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張漱菡，《胡秋原傳》，頁 103-104。

直將同性愛等同於傳統「男色」或「變童」。他也不滿楊憂天將所有同性愛都譴責為變態性慾的武斷觀點。因此，胡刻意無限上綱卡本特中性之愛重性靈之說，將之轉譯為中性之愛無肉慾，以為同性愛「脫罪」。當時的胡秋原缺乏性愛經驗，且並非同性戀者，因而比已有同志愛人的卡本特更輕易只從理論或理想層次來美化同性愛，強調此愛只重精神不耽肉慾。許維賢用「去慾望化」來詮釋胡秋原如何「重新想像」同性愛，並讓「同性愛成為極度精神化的純潔情感」。¹¹⁸ 然而，胡秋原在文中表示他接受同性間「某種程度肉體的表現如接吻擁抱」的親暱慾望，認此「極尋常而合理」。他只是強調超出此限度的性行為，已非愛的表現。¹¹⁹ 緣此，我認為胡秋原有意對同性愛「去性化」，而非「去慾望化」。胡這種「去性化」論調，既反映他自身對戀愛的神聖想望，也展露有意過度詮釋卡本特理念來洗清同性愛污名的論述策略。

胡秋原「去性化」的同性愛論述雖略有別於卡本特靈肉合一的中性論，卻適切發揮了後者以友愛來詮釋同性愛的普世真諦。藉此，胡秋原凸顯同性的精神之愛可昇華異性的平庸戀情。一方面，他力圖以同性愛重情感結合的「深刻神秘與偉大」，來提升異性戀只為「生活、後嗣與性慾」而結合的利己庸俗缺失。¹²⁰ 另一方面，他承襲卡本特哲思，發揚「友愛」這個體現同性愛真摯雋永而無私奉獻的平等關係，做為建構新社會的精神基礎。胡秋原援用卡本特之說，論證同性

118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性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頁23-25。

119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201-202。

120 秋原，〈新故的卡本特〉，《北新》（上海），卷3期15（1929年8月），頁47；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195。

愛如友誼般結合，得「使兩個情人從家庭生活之負累與阻礙之下，得到自由和解放」。進而，胡更翻譯卡本特之文，申言同性愛無關乎種族繁衍，反得以「在社會底英雄底事業上，亦有其特殊的作用；而雖然他不能產生有形的兒女，但是『心底兒女』（children of the mind），那感化我們人生和社會生活的哲理觀念與理想，就是它產生的甯馨兒。」¹²¹ 胡秋原彷彿卡本特的代言人，從宏觀的社會主義和重視個人性靈解放／交流的視角，來理解與定位同性愛。¹²² 胡秋原不僅援用具昇華愛情與淨化性慾本質的同性愛，來提煉戀愛真義、改造社會與重塑文明，也以此挑戰楊憂天的病理論點。

尤有甚者，胡秋原除了發揚中性論的精髓之外，更以〈新故的卡本特〉一文，向中國讀者介紹他所謂「卡本特主義」所投射的前瞻思想價值。此文勾勒卡本特體大思精的人本哲學，指他「以深遠的眼光，明智的態度，用了他賅博的知識，接觸了哲學科學藝術宗教政治的各面，發抒了偉大的見解，對於文化及社會作了痛快無比之批評。」¹²³ 胡秋原把卡本特主義詮釋為痛擊資本主義與揭穿「現代生活虛偽醜惡」的明燈，一種正確針砭現代物質文明並啓示未來新生活的靈光。其中，胡秋原特別推崇卡本特「人情的科學」，實為深刻反省現代科學的缺失並主張兼顧情感經驗與人文關懷的真科學。對胡而言，這樣的真科學有別於遠離人性缺乏認知美德的壞科學或偽科學。胡秋原對卡本特「人情的科學」觀之詮

121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186。

122 蔡孟哲，〈自由、平等、同性愛：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性／別論述〉，《中外文學》，卷51期1（2022年3月），頁131-162。

123 秋原，〈新故的卡本特〉，《北新》（上海），卷3期15（1929年8月），頁42。

釋，呈顯出一種「情理平衡」的新科學認識論。此種認知，有別於五四以降科玄論戰與中共歷史唯物史觀中，物質與精神非此即彼的極端立場。¹²⁴

綜觀楊憂天與胡秋原代表的兩種同性愛觀，其差異癥結不在於爭議同性愛是先天或後天，而是前者獨尊科學性學，後者則以卡本特的人情性學為宗。此二種性學都有科學論據，但科學性學只強調無感覺的純理性觀察、實驗與診斷。相較之下，人情性學除了客觀探查判別之外，更綜合歷史現象和社會發展，並考量文化與個人情感經驗，來分析與歸結人類的性表現。

胡秋原對卡本特中性論及人情性學的闡釋，頗有深度。惟當時及之後中國的同性愛論述，顯然朝楊憂天展示的科學性學趨向發展，即以生物、病理、心理與精神分析學為主。卡本特的中性論，並未因胡秋原幾篇有力道之作，便說服中國讀者拋棄對同性愛的成見。1920年代末的中國，進入國民黨北伐統一進行訓政、中共從邊緣地區求生存發展的新階段。國共兩黨，都冀望通過規訓個人身體與性慾來強化其統治基礎。青年男女的情慾實踐，益發受到各界權威及社會輿論的重視。¹²⁵ 1932年初，浙江發生一起杭州藝專學生陶思瑾似因同性愛妒殺劉夢瑩的轟動命案。此後，各大報刊日益將同性愛、女性（尤其女學生）與精神問題（陶被疑精神失常）緊密連結。此後，同性愛的污名更深，且常被視為女性

124 秋原，〈新故的卡本特〉，《北新》（上海），卷3期15（1929年8月），頁52-55；另見Edward Carpenter, *Civilisation: Its Cause and Cur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1), pp. 219-242.

125 陳靜梅，《現代中國同性戀愛話語譯介及小說文本解讀》，頁92。

易患之「病」。¹²⁶ 1920年代對女學生同性愛相對寬容的輿論態度（前提是純精神相戀無肉體結合），到下個年代迅速消失。論者愈來愈理所當然以「變態」、「病態」甚至「畸形」來形容同性愛，認定其無論是先天使然或環境造成，都亟應加以防止與治療。1934年底的《玲瓏》雜誌上，署名萍的某位論者呼籲將「患」同性愛症狀者「善導之入異性愛的正軌」。1946年8月，有篇內容與萍文完全相同、但未署名的文章，再次出現於上海《精華》周刊。¹²⁷ 這類論述為數不鮮，多以放寬男女社交、普及性教育與鼓勵結婚為治療同性愛之道。不少論者雖提及西方自古至今多有名人或文藝作家為同性愛者，卻仍認定同性愛是變態性慾。¹²⁸

縱然如此，卡本特的中性論並未完全銷聲匿跡於異性戀本位論述強勢主導的1930年代中國社會。當時仍存在少數較正面看待同性間情感的論者，其中亦有人隱約呼應卡本特的中性精神。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戀愛教育之研究》，編者鄭嬰曾舉希臘哲人為例，指「同性愛之間，並不一定犯道德上與生理上之罪惡的，也有受真情之流的洗禮而營崇高的(Pure love)精神生活的。」¹²⁹ 此種承認同性愛當中有性靈之交的見解，依稀有著卡本特論述的影子。此外，

126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130-144。

127 萍，〈同性愛之原因與弊害〉，《玲瓏》（上海），卷4期38（1934年12月5日），頁2426-2428；〈同性愛：原因與弊害〉，《精華》（上海），卷2革新期20（1946年8月17日），頁8。

128 例見葆荃，〈變態性慾及其現象〉，《時代漫畫》（上海），期5（1934年5月20日），頁3-4；為佳譯，〈變態性慾與文學〉，《沙漠畫報》（北京），卷2期30（1939年8月12日），頁10。

129 鄭嬰編，《戀愛教育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3。

北平《現代青年》半月刊在1936年5月推出收錄六篇文章的「同性愛問題特輯」，其中五篇譴責同性愛，唯獨有篇〈談同性愛〉反其道而行。〈談同性愛〉的作者「鏞銛」，將幼年、青春期與成人期的同性情感，分別描繪為「天真」、「情欲」與「精神」三種性質相異的同性愛。該文將同性愛詮釋為「取愛情與友情的成分各半而形成的混合體」，並形容它「是溫柔的情緒，微妙的夢境與高潔的精神而寫成的詩歌。」鏞銛特別頌揚20歲之後成人「建築在精神上的同性愛」，甚至將之讚為「人生的瓊寶，人類的飲食」。鏞銛還在文末表示：「我希望有心嘗試同性愛的青年男女，要把這個愛擴大起來，去愛整個世界上的男男女女。」¹³⁰ 這篇文章以某種浪漫筆調高度肯定甚至期許成人同性愛，其雖未提及任何西方性學家，卻相當具有卡本特中性論的色彩。

民國後期如鏞銛這類挺同論述，著實屈指可數；但這不表示卡本特的思想被民國讀者忽略遺忘。本文最後一節，將舉證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將卡本特視為如愛倫凱般，闡揚男女新戀愛觀的代表人物。這種對卡本特的主觀認定，反映出民國社會雖積極譯介各類外國學說以形構性慾的現代性，卻仍以男女二元思維接受新思想，建立起異性戀本位的現代性慾範式。

130 鏞銛，〈談同性愛〉，《現代青年》（北平），卷3期3（1936年5月15日），頁15-16。

五、「新社會男女的嚮導」： 中國論者對卡本特的集體異性戀轉譯

卡本特的中性論在 1920 年代數度出現中譯本，但鮮少有論者將之引述延伸。相對而言，援用卡本特著作來發揮異性婚戀與婦女解放論點的中文著作，則不乏可見。此種特殊的譯介現象，清楚顯現於《婦女雜誌》這份引領 1920 年代兩性論述新思潮的刊物。除了「正聲」的孤音獨唱之外，該誌其他作者多少受主編章錫琛引導的異性戀論述走向影響，從兩性而非中性視角來引介卡本特思想。此外，包括《新女性》、《學生雜誌》與《民國日報》，還有多本（包括戰後出版的）以戀愛結婚為主題的專書等，也介紹過卡本特為性慾正名與主張戀愛、自由結婚和婦女解放的論述。這類論著清一色把卡本特劃歸到提倡兩性戀愛的專家陣營，將他與易卜生、愛倫凱、高德曼及羅素等人的著作相提並論。我認為，這類中文論著，既參與又反映民國時期男女性慾範式的建構歷程。它們把卡本特定位為闡述兩性問題的社會思想家，連帶壓縮了卡本特中性論的傳播空間。換言之，中國多數作者只從男女二元思維來理解與接收卡本特的學理，對其中性論則持「譯而不宣」的態度。我將這種論述取舍，稱為民國作者對卡本特性學思想的集體異性戀轉譯。

此一集體轉譯的特色，首先展現在凸顯卡本特《愛的成年》所觸及的各種兩性論見。1921 年秋，吳覺農以筆名「Y.D.」在《婦女雜誌》發表專文〈谷本忒氏的婚姻問題觀〉，稱頌卡本特為「近代的大思想家」，是「主張『精神主義』的社會改造論者」。吳覺農著重介紹卡本特在《愛的成年》基於

批判既有婚制而展望未來的主張，包括提倡性慾教育、改良婚姻法律、增進婦女自由獨立，並打破從屬關係。¹³¹ 《婦女雜誌》另有多篇引介卡本特思想的文章，繼續衍申其論及戀愛真諦、現代理想婦女特質、打破性慾污名、建設新家庭與改良一夫一妻制的觀點。¹³² 擔任《學生雜誌》主編的中共黨員楊賢江，於1924年初在該誌發表社評〈戀愛神聖論者的兩難〉，徵引卡本特《愛的成年》某些片段，說明性教育欠缺與社交不公開對青年男女造成的影響。¹³³ 章錫琛的開明書店，在1929年再版夏丏尊翻譯廚川白村原著的《近代的戀愛觀》，其首頁便引卡本特《愛的成年》某段話來綜括全書主旨。此書又以愛倫凱與卡本特之論，界定戀愛「就是因了異性的二個人的結合，互把其『人』的自己充實完成的兩性的交響樂而已。」¹³⁴ 前述郭真（即高爾柏）出版於1929年的《戀愛論ABC》，雖曾簡述卡本特的同性愛，但明顯仍以男女為戀愛主體來介紹卡本特的理論。郭真同年另一本《結婚論ABC》也有專章介紹卡本特的婚姻思想，無涉同性愛。¹³⁵ 國民黨知識菁英呂雲章(1891-1974)出版於1933年的

131 Y.D.，〈谷本忒氏的婚姻問題觀〉，《婦女雜誌》（上海），卷7號9（1921年9月），頁16-20。

132 例見紫瑚，〈現代婦女的三型〉，《婦女雜誌》（上海），卷8號1（1922年1月），頁12-13；晏始，〈婦女問題與性的研究〉，《婦女雜誌》，卷8號2（1922年2月），頁18-19；黃石，〈家庭組合論〉，《婦女雜誌》（上海），卷9號12（1923年12月），頁20-26。

133 賢江，〈戀愛神聖論者的兩難〉，《學生雜誌》（上海），卷11號1（1924年1月），頁13-15。

134 廚川白村著，夏丏尊譯，《近代的戀愛觀》（上海：開明書店，1929，再版），頁14。

135 郭真，《戀愛論ABC》，頁50-67；郭真，《結婚論ABC》（上海：

《婦女問題論文集》，也曾引卡本特之言，強調兩性在經過改造的自由社會裡，都將不復為他人的奴隸。¹³⁶

類似這些從兩性關係的視角來詮釋卡本特思想的中文著作，持續到對日抗戰後的 1949 年。該年，資深出版人張靜廬(1898-1969)發行《戀愛觀與戀愛藝術》，由橫跨政教界的孫起孟(1911-2010)與孫蘊合寫。此書效法民國時期眾多談婚戀性慾的著作，摘引包括卡本特在內的歐美思想家，說明(兩性)戀愛的真諦與不正確的戀愛觀等課題。¹³⁷ 以上著作，旨在強調卡本特作品中闡揚兩性理想關係的見解。

另一種中國論者對卡本特著作的文化轉譯特色，則是即使觸及他的中性論，卻刻意忽略或對其視而不見。1924 年初，趙康在《學生雜誌》發表〈戀愛新論〉一文，強調戀愛「祇存在於異性的人類中間」，充分展現其建構男女為戀愛主體的異性戀思維。¹³⁸ 玩味的是，在趙康為說明其戀愛「新論」而自製的圖表中，卻出現引自卡本特《愛的成年》中的「烏拉寧〔註：即 Urning〕式之愛」(圖 1)。根據趙康的界定，此種愛與「兄弟與姊妹之愛」及「異性的友誼」同類，屬於發乎心理性感的「性的愛」與人格感應的「靈的愛」二者之結合。換言之，「烏拉寧式之愛」無涉肉體，其涉及「性感」的部分乃「因性情諧和而得到一種快感」之意。問題是，趙康雖明確指出「烏拉寧式之愛」來自卡本特著作，卻隻字未

世界書局，1929），頁 68-78。

136 呂雲章，《婦女問題論文集》（上海：女子書店，1933），頁 23-37。

137 孫起孟、孫蘊，《戀愛觀與戀愛藝術》（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49），頁 7。

138 趙康，〈戀愛新論〉，《學生雜誌》（上海），卷 11 期 1（1924 年 1 月），頁 7-12。

提此愛乃同性間之愛；此字眼出現於此圖表中，完全失卻了卡本特賦予的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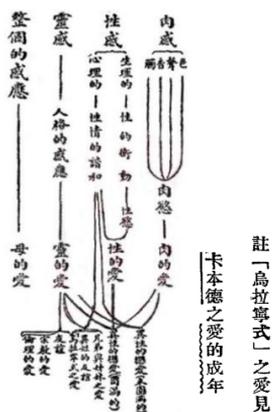


圖 1、「愛的分析圖」¹³⁹

至於譯介過卡本特的中性論卻對之視若無睹的好例子，來自樊仲雲。他從 1925 到 1929 年陸續發表於《民鐸》、《新女性》與《現代小說》的卡本特譯作，數量甚至勝過胡秋原。樊仲雲還選譯過卡本特的自傳憶述《愛的成年》與《中性論》出版經過的部分。然而，他對卡本特維護同性愛的論點卻置若罔聞，未曾回應。1927 年，樊將先前連載於《民鐸》之〈戀愛的成熟〉改名為《加本特戀愛論》，由開明書局納入「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發行單行本。章錫琛在《新女性》上為此書刊登廣告時，以「性道德革命的先鋒，新社會男女的嚮導」為標題來宣傳。這則廣告形容此書「對於性慾的抑制和解放男女間應抱的態度和應守的道德，婚姻制度的錯誤和

139 趙康，〈戀愛新論〉，《學生雜誌》（上海），卷 11 期 1（1924 年 1 月），頁 9。

改正，自由社會裏兩性關係的正鵠，都有極正確極透關的論斷，為新社會青年男女不可不讀之書。」¹⁴⁰ 這些介紹，全然忽視卡本特在該書企圖傳遞的中性論訊息。

結 論

卡本特的性學思想在民國的傳譯，揭示了異性戀崛起成爲主流的性話語，並將同性愛貶抑爲性慾他者的關鍵歷程。清末以來，西化知識分子逐漸放棄傳統家族本位的安排婚姻，轉而接受以當事人意願爲重的文明婚姻。理念上，中式婚姻缺乏愛情（觀）、夫爲妻綱且獨重女子貞節，而近代西方則開始強調以愛爲基礎、平等互待的自由結婚。然而，不論中國宇宙觀的陰陽互補理念，抑或西方性學對性表現正常或異常的界定，都是以男女的二元框架爲依據。從傳統儒家的兩性秩序到近代西方的自由婚戀思想，異性結合的根本核心始終如一，並無改變。換言之，易卜生和愛倫凱等歐美新思想與科學性學帶給中國的主要影響，是使傳統的異性「婚」演變爲現代的異性「戀」。自五四以降，醫學或生物等現代學科對身體與性慾的論述，逐漸成爲各大報刊與書局關注的出版課題。1920年代後，中國男女不只成了有性慾的主體，兩性之別也開始奠基在性慾與性別氣質的明確區隔上。《婦女雜誌》與《新女性》這類重靈輕肉的婚戀論述，以及《新文化》致力於「優美交媾法」的性愛美學，從兩個向度促成現代異性戀範式的成形。

140 〈全譯加本特戀愛論（廣告）〉，《新女性》（上海），卷2期11（1927年11月），無頁碼。

此時譯介卡本特論著的中國作者，清一色是致力顛覆禮教性別秩序與改造社會的男性知青。他們對外來愛慾理論兼容並蓄卻有明顯輕重擇取的思想傾向，導致「徵引卡本特來闡揚兩性婚戀問題」、與「翻譯卡本特宣揚同性愛的中性論」這兩類出版品並存的現象。這個全男性的中文譯介陣容，不同於日本有幾位女作家透過譯介卡本特的中性論，來為女性的主體性與情慾自主發聲。¹⁴¹ 男女藉自由婚戀生育成家的思想，切合中國男性譯者的個人情愛嚮往、社會進步意識乃至於國族優生理念。他們以異性戀意識來理解與介紹卡本特的性學著作，因而改變其思想原貌。卡本特的性學作品在中國被曲解誤譯、片段翻譯與任意挪用的現象，反映引介外國思潮的男性菁英，看似允許百家爭鳴，實則多有先入之見。不論是為滿足小我或完成大我，他們出於男性本位而建構的異性戀範式，暴露出民國戀愛自由的限度。那是一種不允許同性情慾或女性獨身等有違男性利益的限定自由。

卡本特的人情性學，本意在跨越非男即女的兩性二元框架，揭櫫同性愛的真摯情感與社會貢獻，以宣揚性別和情慾適性自然發展的真正民主精神。他的中國譯者卻普遍用「男女」或「兩性」，來對譯他書中「人類」與「性慾」這類無意受限於二元性別的中性字眼。《愛的成年》在中文語境，就這樣被定位為討論男女問題的名著。自民國以來對卡本特作品的誤譯所造成的扭曲影響，甚至持續至今。樊仲雲當年用「兩

141 Michiko Suzuki, "The Translation of Edward Carpenter's *The Intermediate Sex*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Heike Bauer ed., *Sexology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ncounters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pp. 197-215.

性問題」的字眼，來對譯卡本特原文中的「sex-questions」（較正確的譯法應是「性問題」）。某些當代學者引用樊譯本時，因未加檢證原文，不僅誤以為 19 世紀末的英國社會仍然禁止「公開討論兩性問題」，還理所當然將卡本特定位為討論「戀愛與兩性道德」的思想家。¹⁴²

正因卡本特思想反映民國時人對異／同性戀論述的取捨詮釋，其在中國傳播的意義，便有別於只關心兩性關係的愛倫凱。誠然，愛倫凱異性本位的戀愛自由論，「厥為民國社會改變兩性社交、婚戀與家庭關係的首要思想來源」。¹⁴³在這些方面，卡本特思想宛如映襯愛倫凱的最佳綠葉，常被中國論者依次援用來討論兩性問題。但是，卡本特所闡述的中性，允許人類社會突破長久以來對性／別僵化的二元認知，開闢了性慾演化與性別流動的前景。他的中性論主張突破男女格局的情慾結合，不只顛覆了中外古今一以貫之的異性本位思維，其允許的自由程度，也高過愛倫凱等人所詮釋的戀愛觀。特別是，卡本特的中性論堪謂民國時期唯一凌駕性／別二元論來捍衛同性情慾的思想。當時包括藹理士等其他性學家，皆秉持切合生殖目標的異性戀範式，認定正常的性慾只存在於兩性之間。因此，他們將同性間的情慾稱為「性逆轉／倒錯」，意指「本應」針對異性而發的慾望，卻轉到

142 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新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期 1（2014 年），頁 158-180；楊聯芬，《浪漫的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 31，註釋 2。關於這段長期被中國人誤譯的卡本特原文，見 Edward Carpenter,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pp. 194-195.

143 許慧琦，〈愛倫凱在中國：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7（2021 年 6 月），頁 56。

同性身上。即使烏利斯最早承認社會上有一群人無法被歸為男女兩類性別之內，他仍將自己所認同的「Urning」界定為「男人身體裡困著女人的靈魂」之人。¹⁴⁴卡本特則質疑這類兩性身心錯置的理論。他並不認為男人愛男人（一如女人愛女人），必然是把對方當異性一般，或是因自身性別認同逆轉才會愛上同性。

卡本特此番獨特見解，對後世產生兩種重要的影響。一是承認實踐同性愛的中性是一種正常的性人格，就如男性或女性的性／別身分。二是宣揚以深摯崇高的同性情誼，作為建設民主新世界的精神基礎。此二影響皆清晰展現在胡秋原譯述卡本特的著作中。但胡秋原也只認同性愛的心靈結合，以此強調同志情誼的精神價值與社會文化貢獻。其他中國作者則若非擁抱愛倫凱式的兩性婚戀觀，就是接受科學性學對同性戀的病理分析。他們既未能完整理解中性論，遑論受此一理念啟發而扭轉他們看待同性愛的偏差眼光。

過去的研究對同性戀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定位，見解分歧。早期桑梓蘭與康文慶的研究，強調民國時人多從關係與互動的視角來看待同性愛，較少將之視為個人的認同選項。姜學豪晚近的專書，則挑戰前人學者的看法。姜指出，在民國性學專家和大眾眼中，「同性戀既是個社會問題，也是個人問題——一個關於人格、主體性和身份的明確問題。」¹⁴⁵上述兩類觀點，皆須同時考慮民國性論述隨時而移的演變，

144 Edward Carpenter,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pp. 19-20.

145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p. 131.

才能更精確掌握不同階段的特色。本文的卡本特研究，則可有助釐清此種階段性特色。我之前對葛理士在中國傳譯的研究，顯示民國時期的性學，在學科訓練與論述重點方面至少應分為兩個相異的世代。五四前後到 1920 年代中期，像章錫琛那種「業餘性學家」，仰賴日文資料且側重性慾的道德後果與社會效應。1920 年代中期之後，業餘性學家雖仍不絕如縷，但已開始出現像潘光旦這類「專業性學家」。他們受歐美科學性學訓練，從生物、遺傳、精神分析學或社會學出發，檢視個人性慾對自身與社會的多重影響。¹⁴⁶ 卡本特在中國的譯介過程，既應證兩個世代確有不同論述重點，也反映專業性學家在 1930 年代之後明確掌握論述權威。〈中性論〉的中文版雖在 1920 年前期已出現，但時人反而只引述卡本特來談男女婚戀，並把他對性慾的剖析一廂情願地解釋為兩性性慾。彼時論者基本上將同性愛視為一種偏差的性表現，而非有主體意識的性人格。換言之，他們雖已逐漸從性慾出發來建構兩性主體與性別身分，卻未真正把同性愛視為一種性人格來討論。直到 1929 年，胡秋原對《中性論》的譯述，才讓中國讀者認識到先天的同性愛（可以）是跟異性戀一樣健康正常的性傾向。¹⁴⁷ 職此，姜學豪的論點應被修正為「五四時期的同性戀論述主要側重社會與道德面向，到 1920 年代後期才逐漸演變為既是社會問題、也是個人問題。」楊憂

146 Rachel Hui-Chi Hsu, "The 'Ellis Effect': Translating Sexual Scienc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49)," in Veronika Fuechtner, Douglas E. Haynes, and Ryan Jones, eds., *A Global History of Sexual Science, 188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 186-210.

147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性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頁 131。

天〈同性愛的問題〉一文，集歐陸科學性學之大成，從「性目的」與「性對象」出發來討論同性愛。¹⁴⁸ 但楊與 1930 年代後的專業性學家都從異性戀出發，將同性愛貶為變態或病態的「性人格」。由此看來，民國時期似僅有胡秋原一人，發揚卡本特中性論，賦予有先天同性愛傾向者一種正常的「同性戀身分」(gay identity)。

自 1930 年代以降，接受科學性學理論的各界專家益發展現權威，從生理心理學或內分泌精神病學出發，主導社會大眾對性慾的認識與分類。此後仍有人援用卡本特的思想來討論兩性婚戀，他的中性論則迅速淡出中國報刊文化界，幾成絕響。然而，百年過後的當代，卡本特認可性慾／別的流動性可裨益社會發展與情感交流的觀點，至今仍未過時。回首民國，讓人不禁好奇：若當時他的人情性學足以抗衡理性傲慢的科學性學，中國社會是否得有機會發展真正的情慾民主？

148 陳靜梅，《現代中國同性戀愛話語譯介及小說文本解讀》，頁 93-97。

徵引書目

一、報刊

- 《文藝研究》（上海），1930。
《北新》（上海），1929。
《民國日報·婦女評論》（上海），1923。
《民國日報·婦女週報》（上海），1923-1924。
《民鐸雜誌》（上海），1924、1925、1926。
《沙漠畫報》（北京），1939。
《星期評論》（上海），1919。
《玲瓏》（上海），1934。
《時代漫畫》（上海），1934。
《時事新報》（上海），1919。
《婦女時報》（上海），1912。
《婦女雜誌》（上海），1920-1923、1925。
《教育雜誌》（上海），1923。
《現代青年》（北平），1936。
《復旦年刊》（上海），1922。
《新女性》（上海），1927、1929。
《新文化》（上海），1927。
《新青年》（上海），1918。
《新潮》（北京），1919。
《精華》（上海），1946。
《學生雜誌》（上海），1924。
《讀書雜誌》（上海），1933。

二、史料

卡本忒(Edward Carpenter)著，郭昭熙譯，《愛的成年》。上海：大江書鋪，1930，再版。

任白濤輯譯，《近代戀愛名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

呂雲章，《婦女問題論文集》。上海：女子書店，1933。

孫起孟、孫蘊，《戀愛觀與戀愛藝術》。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49。
教育總署編審會著，《高中女子修身（第三冊）》。北京：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41。

郭眞，《結婚論 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

郭眞，《戀愛論 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

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著，后安譯，《愛的成年》。北京：晨報社，1924，第4版。

廚川白村著，夏丐尊譯，《近代的戀愛觀》。上海：開明書店，1929，再版。

鄭嬰編，《戀愛教育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Carpenter, Edward. *Civilisation: Its Cause and Cur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1.

Carpenter, Edward. *Homogenic Love, and Its Place in a Free Society*. Manchester: The Labour Press Society, Ltd., 1894.

Carpenter, Edward.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6.

Carpenter, Edward.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Carpenter, Edward. *The Intermediate Sex: A Study of Some*

Transitional Types of Men and Women.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8.

Carpenter, Edward. *Towards Democracy*.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5.

Carpenter, Edward. *Towards Democracy*.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22.

Ellis, Havelock.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 Sexual Inversion*.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08.

Key, Ellen. *Love and Marriage*. Translated by Arthur G. Chater.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1.

Key, Ellen. *The Woman Movement*. Translated by Mamah Bouton Borthwick.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2.

Sanger, Margaret.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38.

Weininger, Otto. *Sex and Characte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6.

三、專書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張漱茵，《胡秋原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23。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

陳靜梅，《現代中國同性戀愛話語譯介及小說文本解讀》。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
- 楊聯芬，《浪漫的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 Anderson, Brian. *Edward Carpenter, A Victorian Rebel Fighting for Gay Rights*. Leicestershire: Matador, 2021.
- 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auer, Heike. *English Literary Sexology: Translations of Inversion, 1860-1930*.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Chiang, Howard.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 Kang, Wenqi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Kennedy, Hubert. *Karl Heinrich Ulrichs: Pioneer of the Modern Gay Movement*. San Francisco: Peremptory Publications, 2002.
- LeVay, Simon. *Queer Science: The Use and Abuse of Research into Homosexu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 Rowbotham, Sheila. *Edward Carpenter: A Life of Liberty and Love*. London: Verso, 2008.
- Sang, Tze-Lan D.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四、論文

- 宋少鵬，〈清末民初“女性”觀念的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

- 刊》，期 5，2012 年，頁 102-116。
-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
- 許慧琦，〈致葛理士(Havelock Ellis)：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的跨界挪用與革命反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57，2022 年 5 月，頁 139-192。
- 許慧琦，〈愛倫凱在中國：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7，2021 年 6 月，頁 1-69。
- 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新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期 1，2014 年，頁 158-180。
- 蔡孟哲，〈自由、平等、同性愛：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性／別論述〉，《中外文學》，卷 51 期 1，2022 年 3 月，頁 131-162。
- Frederick, Sarah. “Yamakawa Kikue and Edward Carpenter: Translation, Affiliation, and Queer Internationalism.” In Julia C. Bullock, Ayako Kano, and James Welker, eds., *Rethinking Japanese Feminis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187-204.
- Hiroko, Sakamoto. “The Cult of ‘Love and Eugenics’ in May Fourth Movement Discours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2:2, Fall 2004, pp. 329-376.
- Hsu, Rachel Hui-Chi. “The ‘Ellis Effect’: Translating Sexual Scienc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49).” In Veronika Fuechtner, Douglas E. Haynes, and Ryan Jones, eds., *A Global History of Sexual Science, 188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 186-210.

- Kavka, Misha. "The 'Alluring Abyss of Nothingness': Misogyny and (Male) Hysteria in Otto Weininger." *New German Critique* 66, Autumn 1995, pp. 123-145.
- Leng, Kirsten. "Permutations of the Third Sex: Sexology, Subjectivity, and Antimaternalist Femin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igns* 40:1, Autumn 2014, pp. 227-254.
- Quinn, Josephine Crawley and Christopher Brooke. "'Affection in Education': Edward Carpenter, John Addington Symonds and the Politics of Greek Lov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7:5, October 2011, pp. 683-698.
- Rowbotham, Sheila. "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 A Very Modern Victorian." *Key Words: 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7, 2009, pp. 8-19.
- Schulz, David. "Redressing Oscar: Performance and 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 *TDR* 40:2, Summer 1996, pp. 37-59.
- Suzuki, Michiko. "The Translation of Edward Carpenter's *The Intermediate Sex*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Heike Bauer ed., *Sexology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ncounters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97-215.
- Twells, Alison. "'Eros the Great Leveller': Edward Carpenter, Sexual Cosmotopianism and the Northern Working Man." *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22:3, Winter 2021, pp. 1-24.
- Ulrichs, Karl Heinrich. *The Riddle of "Man-Manly" Love: The Pioneering Work on Male Homosexuality, Vol. I*. Translated by Michael A. Lombardi-Nash.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4.

Edward Carpenter's Humane Sexology in China: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Adaption of Discourses on Homosexuality and Heterosexuality in Republican China

Rachel Hui-Chi Hsu *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undert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sexual theory proffered by British socialist thinker 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 before and after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I highlight the heterogeneity of modern sexology and explore the arguments, gendered thinking, and cross-cultural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authors when encountering or responding to these sexological ideas. Carpenter's works on sexology served 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bridge connecting discourses on homosexuality and heterosexuality in Republican China, Chinese-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which include two primary aspects: "mainstreaming heterosexuality" and "justifying homosexuality." Howev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ten introduced or quoted Carpenter's discourse on heterosexual relations without mentioning his thought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garding homosexuality, or vice versa.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is rather unique phenomenon of transla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Carpenter's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In other words, what ideological tendenci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 doe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 at that time? To clarify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irculation and local evolution of Carpenter's thought in a cross-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context.

Two main points are argued in this article: first, I interpret Carpenter's theory on sexuality as "humane sexology" in distinction to the "scientific sexology" represented by continental Europe, particularly German sexologists, so as to elucidate the multiple sources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 of foreign theorie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exuality in Republican China. Secondly, I demonstrate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Carpenter's works both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emergent modern sex/gender discourse of constructing heteronormativity in China. This discursive process illuminates that Carpenter's description of ideal love was interpreted out of the wishful thinking of Chinese male intellectuals as heterosexual oriented, and despite emerging fleetingly in 1920s China, his deep praise of male-male love was replaced by the mainstreamed pathological theory of homosexuality.

Keywords: Edward Carpenter, homosexuality, heterosexuality, cultural translation, Republican era